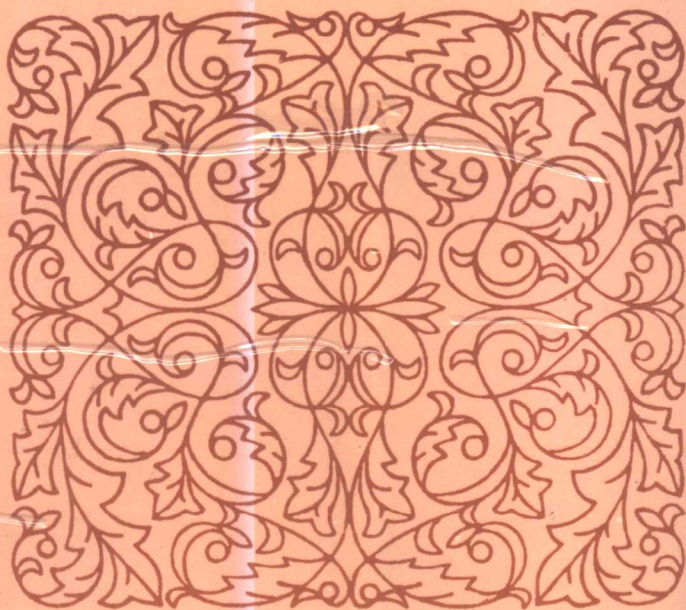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1 •



---

---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1 ·

歷史·地理類

中國社會史研究

熊得山著

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

李季著

上海書店

---

---

---

李季著

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本書據神州國光社1936年版影印

## 目次

## 序言

- 一 關於中國社會史上爭論的主要問題及其解決所必具的先決條件……………一
- 二 馬克思對於經濟發展分期的指示和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內容……………八
- 三 中國經濟時期的劃分及其說明……………一七
- 一 自唐虞以前至漢末爲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至紀元前二二〇六年爲止)
- 二 自夏至殷末爲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時代(紀元前二二〇五至一一三五年)
- 三 自周至周末爲封建的生產方法時代(紀元前一三三四至二四七年)
- 四 自秦至清鴉片戰爭前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紀元前二四六年至紀元後一八三九年)
- 五 自鴉片戰爭至現在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一八四〇年起)

四 介紹並批評各種劃分中國經濟時期的說法…………… 100

一 關於陳邦國君的

二 關於郭沫若君的

a. 應用摩爾根的前史人類進化階段方式的錯誤 b. 應用馬克思的經濟史分期的錯誤

三 關於陶希聖君的

a. 關於中國社會（特別是自秦漢至清代）的性質問題 b. 關於秦漢至清代統治階級的問題

c. 關於儒法道墨等家學說的階級性問題 d. 關於前資本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革命特徵

的問題 e. 關於其他問題

附錄

對於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等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的迎戰…………… 四四九

a. 幼稚 b. 矛盾 c. 庸俗 d. 虛偽

## 序言

凡從前清國文老夫子手中經過的人大都知道他們對於學生——特別是所謂高材生——的作文的批語是如何的虛偽而誇張。記得我有一個同鄉作一篇秦始皇拿破崙合論，文字不過清順，而他所得的批語是：

『胸羅廿四史，目睨五大洲；太史公作史，兼才學識，韓文公爲文，起八代衰，作者固未遑多讓也，偉哉！』

像這樣肉麻的話決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實足以代表一般國文老夫子的傾向，這正是中國士子的誇大狂。

然這種誇大狂的傾向是一種畸形的發展，牠只向好的方面走，而不向壞的方面走。無論學生的文章怎樣狗屁不通，總可以得到「可以觀」，「清順無疵」，或「流利如哀梨并剪」這一

類的批語。在這種風氣之下，學生們得到一個好的批語，雖未必「榮于華袞」，而得到一個不好的批語，却是「嚴于斧鉞」。當我在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已是一個「高材生」，有一次的作文題目出自周禮（題目已不能記憶），我用心做了一篇自鳴得意的文章，不過偶然疑及周禮係偽書，有些不可靠。國文老夫子皮先生見了，勃然大怒，不獨將我所懷疑之點全部勾去，並且于給予零分之外，復打一個長批云：

「周禮晚出，聚議紛如，橫渠語錄，稱周禮爲的當之書。作者對茲古籍，輒肆猜疑，既破壞大聖人「信而好古」之風，尤易啓乖張者「離經叛道」之漸。論履霜以冰至，本應令「小子鳴鼓而攻」，姑略跡而原心，特扣去全部分數以警！」

皮老夫子爲防止其他學生效尤起見，特于發卷時大演其說：「四書五經都是聖人的微言大義，後生小子何得懷疑？因爲懷疑這些書，就是懷疑孔夫子，而懷疑孔夫子，便是「非聖無法」！試問你們何所矜式？」這樣的演說詞和文章前面的零分，文章後面的長批，對於我不止于冷水澆背，簡直是一種羞辱；我雖沒有哭泣，但整個的星期，心中萬分難過。從此以後，不獨不敢非議大



聖人的古書，並且不敢非議一切帶有古香古色的古貨。歷史教員說盤古開天地，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天皇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人皇蛇身九首，蚩尤銅頭鐵額，食沙石，能作雲霧——總之，凡他所說的一切古人奇蹟，不獨煞是有趣，不容易忘記，而且我都不得不信，也不敢不信，否則破壞大聖人「信而好古」之風，即不致被同學們「鳴鼓而攻」，但「嚴于斧鉞」的批語，全部分數的扣除和滔滔不竭的演說，都是令人不寒而慄的。

我說出上面三段話，並不是信開口河地編小說，而是陳述過去的一種實際生活，表明一種學風對於青年人具有何等偉大的勢力。我自中學到高師，再轉北京大學，一向是不肯疑古的。尤其是在北大，遇着拖長辮和著春秋大義（英文的）的英文教員辜鴻銘先生，變成他的「高足弟子」，更加強了我信古的力量。所以當文學革命初起來的時候，我是最反對而且最不肯理會這新東西的一人，直到我親自參加了五四運動，才改變向來的態度。因為這種運動實在過于偉大，牠和熱烘烘的大熔爐一樣，把我一向不敢疑古的毛病全都熔化了。我于是奔向新的一途，這就是說，趨入反古的一途，曾于十個月之內，譯出八十萬字關於社會主義的書，就是一個明

證。

不過我當時的反古和從前的信古一樣，係受了一種學風的影響，多出於隨聲附和，並非自己有什麼真知灼見。後來留學歐洲四年，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淘養，對於一切學術上的問題，頗能本着自己的能力加以思考，而不肯隨便盲從。對於中國的古書和古史，也自然取這種態度，但就大體講，還是疑古的成分多而信古的成分少，因為這些東西多半經過後人的改竄，真的中間雜着多量偽的東西，實在不能不令人懷疑。

我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回國。考察國內的學風，疑古的傾向較前加甚。這種風氣起於所謂新文學運動，適之先生當然是其中的領導者，而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正是一個榜樣。梁任公先生在批評這部大著中，曾提出抗議道：

「胡先生的偏處在疑古太過，疑古原不失為治學的一種方法，但太過也很生出毛病；諸君細讀這書，可以看出他一種自定的規律，凡是他所懷疑的書都不徵引（但有時亦破此例，下文再論），所以不惟排斥左傳周禮，連尚書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講古代史，若連尚書」

左傳都一筆勾消，簡直是把祖宗遺產蕩去一大半！我以為總不是學者應採的態度。」（見梁任公學術演講集第一輯八頁）

任公這種抗議本具有充足而健全的理由，可惜他自己是一個玄學家，不能利用現代的科學去治古籍，他雖自有其治學方法，但有許多地方，只是跟着適之先生走，所以一班青年學者對于他失去信仰，把他的話當作耳邊風而不以為意，這便是「以人廢言」了。

梁先生對胡著的批評，原係在北京大學哲學社的一篇講演稿，至一九二二年底才刊印成書，然異年五月六日，努力的讀書雜誌即發表了顧頡剛先生致玄同先生的一封信和按語。他在此信中根據幾部並非歷史的古書，如尚書、論語、詩經之類，提出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見古史辨第一冊六一頁）

的有名的主張，並在按語中總括地說道：

「如這封信裏所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見同書同冊六〇頁）

到了六月十日，讀書雜誌復發表錢玄同先生的回信，更進一步了，信中說：

「先生所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意見，真是精當絕倫。舉堯，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傳說爲證，我看了之後，惟有歡喜贊歎，希望先生用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注意這四字，他們是要無中生有地從腦袋中去『發明』——季）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後來學子不致再被一切僞史所蒙。我從前以爲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一鳥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爲「俊」，大也。（山海經的大荒東經作「帝俊」）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底歷史應該從禹說起……今讀先生之論，證以長發和闕宮兩詩，方知連禹這個人也是很可疑的了。」（見同書同冊六七頁）

顧先生所說的禹是怎樣的呢？他最初的見解沒有成熟，我們可徵引他和劉挾黎胡董八兩先生後來討論所得的結論如下：

「西周中期，禹爲山川之神；後來有了社祭，又爲社神（后土）其神職全在土地上，故

其神蹟從全體上說，爲鋪地，陳列山川，治洪水；從農事上說，爲治溝洫，事耕稼。耕稼與后稷的業混淆，而在事實上必先有了土地，然後可與農事易引起禹的耕稼。先于稷的觀念，故闕宮有后稷讚禹之緒的話。又因當時神人的界限不甚分清，禹又與周族的祖先並稱，故禹的傳說漸漸傾向于「一人王」方面，而與神話脫離。（見同書同冊一一四頁）

自顧錢兩先生這些新奇的偉論發表後，本來引起許多反響，但一班持反對論的人只能在幾部古書裏而滾來滾去，不能利用現代的科學知識去相責難，以致不能克服他們。不僅是這樣，他們這一邊還有好些受過現代科學洗禮的人爲之助威，遂使他們的勢力愈加膨漲。第一個助威的人是哲學博士胡適之先生，他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的一篇論文中說：

「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牠，虛心地試驗牠，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這幾個月的討論不幸漸漸地走向瑣屑的枝葉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讀者被這幾萬字的討論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這個中心的見解，所以我要把牠重提出來，重引起大家的注意」（見

同書同冊一九一頁)

他于說明顧先生「這個見解起于崔述」並舉井田論的演進史爲之闡明後，即進而批駁劉揆蔡先生的意見，末了，總括道：

「以上所說，不過是我個人的讀後感，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

(見同書同冊一九八頁)

第二個助威的人是地質學家，丁在君先生，他于是年二月十一日給顧先生的信中說：

「禹治水之說絕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跡——江尤其如此。」

「去年同揚子江水道委員會的技師 Pelee 君等同赴萬縣，他對我說，「就是要用現代的技術來疏導長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時代的禹如何有這種能力？」

「我說禹是石器時代的人，因爲我們至今沒有發見夏代的銅器」(見同書同冊二

〇八頁)

說：

同時顧先生又善于利用考古家的議論去幫助自己的主張，他有一次徵引適之先生的話

「發見灑池石器時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見同書同冊九九頁）

又有一次徵引王國維古史新證一二章的文字，尤其是第二章，作者舉出秦公敦和齊侯罇的金文，證明「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爲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見同書同冊二六七頁）而顧先生則洋洋得意，加以附跋道：

「顧剛案讀此，知道春秋時秦齊二國的器銘中都說到禹，而所說的正與宋魯二國的頌詩中所舉的詞意相同。他們都看禹爲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湯與后稷）是承接着禹的。他們都不言堯舜，髣髴不知道有堯舜似的（注意：兩種古物上沒有言及堯舜，就是沒有堯舜的證據——季）可見春秋時人對於禹的觀念，對於古史的觀念，東自齊，西至秦，中經魯，宋，大部分很是一致。我前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

史書中說，「那時（春秋）並沒有黃帝，堯，舜，那時最古的人王只有禹。」我很快樂，我這個假設又從王靜安先生的著作裏得到了兩個有力的證據！（見同書同冊二六七頁）

上面各種疑古的說法，本來絲毫沒有理由（反駁批評散見于本書各處）不值識者一粲。不意當斯時也，與顧先生互相唱和的玄同先生竟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把那個上自軍閥，官僚，資本家，學者，下至妓女，綁匪，叫化子，孀三所心愛的「錢」字拋棄不顧，改姓「疑古」藉以譁衆取寵；並且利用他的一點文字學的知識，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中將柳翼謀先生打得落花流水。豈止柳先生，就是「無名小卒」公羊先生，「董道士」，「許老爺」等等也全不在他的眼中（參看同書同冊二三一至二三四頁）他頂着「疑古」的招牌，這樣橫衝直撞之後，告訴我們說：

「清代經師……正因為缺乏「勇于疑古」的膽量，所以「創獲」未免太少了。」（見同書同冊二三四頁）

這樣一來，一班所謂新漢學家或整理國故者是一時勝利了。顧先生把這些討論的文字編



成古史辨第一冊，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版，因書的傳播，使他們的勝利愈加發揚了。

可是他們于這種勝利之後，竟無以為繼，遂致不能繼續維持他們的權威。自他們推翻禹以前的一切帝王後，一般青年學子本來萬分熱烈地希望他們弄出一個頭緒，建設一部信史來。但適之先生于一九二三年七月雖已立下古史的骨幹（參看同書同冊九七至九九頁），顏剛先生雖已于同時企圖建設信史（參看同書同冊九七和九九頁），不意繼古史辨第一冊而出現于各種報章雜誌上面的東西，仍舊是一些沒有頭緒的片段文字。追古史辨第二冊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出版，人們已大失所望，而繼此佈刊的古史辨第三冊兩厚本，更少人過問，因為語其內容，每况愈下，越弄越枝節了。『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大家已經明白看出胡博士所領導的這一派人只能運用唯心而又淺薄的實驗主義，做做校勘的工作，至于建設信史的責任不是他們所能擔負的。同時顧先生也在『一種學問的完成，有待于長期的研究』這種口實之下，把他的終身事業宣佈出來了：

「如果我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為我的結論，那麼，我就是偽史的造作家了，我如何可以

辨別人所作的偽呢！我要求結論之心，或者比了說這句話（按即指他沒有結論）的人還要熱切，但我不敢自己欺騙自己，更不敢欺騙別人。責備我的人們請息了這個想念罷！我是不能滿足你們的要求了！這不是我的不掙氣，使得你們的要求不能滿足。實在這個時代還不容我滿足你們的要求呵！千萬個小問題的解決，足以促進幾個中問題的解決，千萬個中問題的解決，足以促進幾個大問題的解決。只要我們從事于小問題的研究而得其結論，則將來不怕沒有總結論出來。可是在我們幾十年的壽命裏是一定看不見了！」（見古史辨

## 第二册序言三頁

不用說，資產階級許多養尊處優和從容不迫的「學者」對於顧先生這段話是會表示極大的同情和敬意的。但自我們看來，他只是中了實驗主義的毒，僅注意于單個的現象，努力于枝節問題的解決，而不知道先觀察整個的全體，用大刀闊斧劈出一個粗形，然後再來解決各細微之點。譬如革命一樣，先用全力打敗政府軍，取得政府，其餘一切小問題自可連帶解決。但實驗主義者却偏要從一點一滴做起，先解決革命中一切小問題，中問題，然後解決政府軍和政府的大

問題。像這樣，就是一萬年也革命不成。

然這個整理國故派建設信史的權威，雖因事實上的表現和顧先生自己的宣言，完全沒落，而疑古的學風，不獨未曾衰歇，並且愈加高漲起來了。爲什麼呢？因爲另有一派人繼承他們的餘緒，而獨樹一幟，勇猛直前地擔負這種工作了。

這新起的一派，卽所謂新思潮派，領袖就是郭沫若先生。他以前有昂格思，後有郭沫若的態度，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刊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因爲他在序言中自稱「本書的性質可以說是昂格思的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大受青年學子的歡迎。他在序言中很恰切地說道：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的新學界上也支配了幾年，但那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摩着了一些兒邊際？社會的來源既未認清，思想的發生自無從說起。所以我們對於他所「整理」過的一些過程，全部都有從新「批判」的必要。

「我們的「批判」有異于他們的「整理」。」

「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爲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序言二至三頁）

郭先生的確是比整理國故派進了一步，在批判之中，寫出了殷周兩代社會史的雛形。他左手拿住摩爾根的前史人類進化階段的公式，右手拿住馬克思人類史上經濟分期的說法，套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何等冠冕堂皇！但他所謂「批判」精神，仍舊是整理國故派的疑古精神，他幾乎對於一切古書都發生疑問，都認爲不可靠。不過整理國故派是站在「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史」那個抽象的死公式上疑古，而他却是站在龜甲獸骨的遺骸上疑古，這是兩者不同之點。

以上所說的是中國近十餘年來學風的趨向和學術界變遷的大概情形。直至去年十一月，我因讀了神州出版的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感覺很大的興趣，決定起來參戰，遂于倉卒之間，草就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一文，登在今年的該誌二卷二三期上面。我自讀過古史辨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兩部書後，覺得牠們的作者的疑古多係盲目的，而非理智的，玄學的而非科學的，形式邏輯的而非辯證法的。因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史」這種主張雖含有片面的真理，但利用這個死公式，摭拾古書上片段的記載，去把禹當做天神，並推堯舜，宣佈他們爲「無是公」，「烏有先生」，便荒謬絕倫了。同樣，甲骨文和金文雖是最硬扎的證據，可作史料，但利用這種殘缺不全，並非歷史，和文字僅被認識十分之五六的遺物去做唯一無二的史書，並否定一切古籍，便是無理取鬧了。基于這一類和其他科學上的理由，我在參戰論文中對於這些盲目的疑古家和玄學的論史者力持一種反對的態度。舉例來說，我曾反駁：

一，玄同先生的堯舜爲理想的人格的主張，

二，頤剛先生的禹爲天神的主張，

三、適之先生的商爲新石器時代的主張，

四、沫若先生的殷爲游牧社會的主張。

這樣看來，在表面上，我不獨絲毫沒有表見接受他們的主張的痕跡，並且還是熱烈反對他們的一人。但在實際上，我棲息于十幾年濃厚的反古和疑古的空氣中，在偵探的手槍與生活的鐵鞭兩重壓迫之下，既沒有地方借到古書古物，更沒有金錢購買古書古物，甚至于還沒有工夫來細心考察古書古物，所以我于不知不覺之中，受了他們絕大的影響，變成他們在學術上的黑暗勢力底下的半犧牲者！大家看到這裏，也許要大吃一驚，急于追問：這是怎樣一回事？請聽我細述一遍罷。

中國的古籍如尚書之類，多經過後人的改竄增補，而比較後出的書如史記之類，又多係根據這一類的古籍和其他傳說編成，在史料上本來不甚健全，不能完全作爲信史。這是絲毫不用懷疑的。不過一班以疑古爲專業或用疑古做招牌的先生們，即利用此等古書中的若干弱點，你一槍，我一劍，長年累月，連篇累牘，向之進攻，務必盡情推翻古說，自創新奇之論然後快。他們的虎

頭牌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史」和「鋤頭考古學」說來本有幾分動人，更足以增長他們的主張的勢力。同時，那些反對的先生們雖有時也有精闢的議論，但雜着衛道的觀點（如劉挾蓀先生在致顧先生書中，一則曰「這種懷疑的精神，很有影響于我國的人心和史界」，再則曰：「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參看古史辨第一冊一五二、一五三和一八六頁）使敵人得乘虛而入，盡量對這個弱點下攻擊（參看同書同冊一九〇至一九一頁，適之先生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使他們失去羣衆的信仰，藉以鞏固自己的勝利。這是專就顧先生的古史辨講的。至于郭先生的書，只看見在短時期內一版，二版，三版，四版，印個不停，只看見一般青年同聲喝采，沒有看見——至少是我沒有看見——反對的議論。一直至一九三一年爲止，這兩部書的潛勢力是很大的。

我在這種混濁的空氣籠罩之下，開始向牠們進攻，因自己沒有很多的工夫細讀本來帶有毛病的古書，不免對之滿懷疑慮，對於其中所敘的事實，總要打一點折扣。例如我在參戰論文中說：

「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藝五穀」，「教熊羆，獬豸，虎」，這大概不過是種植牧畜的影子，決沒有那樣「藝」與「教」的盛況。同篇又說：「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這雖未必完全可信，至少舜時是有種植業的。」（見讀書雜誌二卷二三期拙文一七頁）

這正是因為不大相信史記靠得住，才把牠對於田野農業的描寫，打一個對折，認為種植業（初步農業）我對於尚書的態度也是如此。我會說過：

「商書的篇幅既多，材料也不少，不過就文體和事蹟看，除盤庚三篇外，類多後人粉飾改竄之詞，很難據為信史。例如湯誓說：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這樣賞罰操諸一人，完全是一個專制君主的口吻，就當時的產業發展情形看，國家還沒有成立，不應有此現象。但內中說：「舍我穡事而割正夏」……這不見得是經過粉飾



或改竄的，因為後人大概只在什麼德，威，刑，賞，仁，義，禮，信等抽象名詞上做工夫……對於經濟狀況絕不措意，不會將牧畜改作農業，藉以誇示將來。」（見同書同期拙文二二頁）

我因為不甚相信湯誓，所以對於內中所描寫的專制君主的話，否認牠的真實性，以為「就當時的產業發展情形看，國家還沒有成立，不應有此現象。」實則當時的田野農業早經發展，亞細亞生產方法底下的專制國家早經出現，而這種專制君主，主的口吻，完全為一種應有的現象。我既對於一切古籍的說法無端打個折扣，抱有盤庚以前的商代為氏族社會末期的成見，所以到處要打折扣，才說得通，譬如我說：

「就郭君書中所列的商殷帝王表……計算，

「殷本紀有三十一帝，內子十八，第十三，

「三代世表有三十一帝，內子十七，第十四，

「古今人表有三十一帝，內子十七，第十四，

「卜辭王氏考有十八帝，內子十四，第四。

「由此可見父傳子的數目較「兄終弟及」的爲多，而三十一帝十七八世中直接傳子的也有十四世，當然不能以「兄終弟及」去總括商殷兩代的帝王。況且自湯開基，卽是子承父業（湯爲主癸子），不是由兄傳弟，尤足爲商的初時已經不是「母系中心的社會」鐵證，因爲在這種社會中，子不能留在本氏族內，無論如何，父的位置不能傳子，商自湯始卽繼父業，復傳之子，足證當時正是以男性爲本位的社會，正爲野蠻的高級。至于以後偶然傳弟，當係無子可傳，或雖有子因故不能傳，故沿着母系制時「兄終弟及」的習慣，暫傳給弟。」（見同書同期拙文一〇三頁。）

這種說法雖勉強可以成立，但很不自然。因爲我們必須把湯誓中專制君主的口吻改掉，豈止于此，必須連帶把湯誓以前的甘誓中專制君主的口吻改掉，才站得住腳，否則在男性本位的氏族社會中雖有父傳子之局，必須經過選舉（詳情可參看本書講商代的各節）與這種專制君主制絕不相容。我們固然可以說這種專制局面也許是經過後人改竄的，未必可信。但虞書也顯然經過後人的改竄，何以這種專制局面不加以堯舜的時代，而「咨四岳」「咨汝二十有二

人」的局面又不加在夏商兩代呢？這種順序恰恰表現唐虞爲氏族社會的末期，夏商爲階級制和國家出現的初期，決非一種偶然的現象，也決不是沒有考古學知識的後人所能僞造的。由此可見我上面指商代父傳子爲氏族社會末期現象的一大段話是不能成立了。

自我的參戰論文付刊後，我即感覺這個矛盾，預備翻案。但在這「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史」與「鋤頭考古學」兩面夾攻所造成的濃厚的疑古空氣中，我有什麼法子可以證明那些本身帶有毛病的古籍，說牠們大部分可靠而使人相信呢？這個問題縈迴于我的腦際，足足有兩個星期之久，沒有法子解決。無已，惟有細心再讀古書和其他書籍，也許能達到目的罷。我後來重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所列的殷代帝王表，將史記殷本紀所載的帝王世系與卜辭王氏考的十八帝詳細比較一下，發見兩者間各帝的名字全同，僅三帝的世數略有差異（已詳本書）頃見申報月刊一卷五號高魯先生殷周年代質疑一文所列的殷世數異同表，內中徵引王靜安先生卜辭考的殷代帝王多至二十七人，不惟較郭先生所列的多九帝，而且世系也不甚相同，如陽甲、郭書所載「卜辭王氏考」作祖丁弟，高文所載「卜辭所有」作祖丁子，又如盤庚、郭書「卜辭王氏

考「作陽甲子，高文所載「卜辭所有」作陽甲弟。我因為要親自查閱王氏的觀堂集林，特致書于一位藏有此書的友人，請將載有此項世數表的一本借我一閱，不意他于親自齎送的途中，竟在黃包車上遺失，害得他反寫信到北平去請人代抄一本，以補殘缺。我既無緣親閱王書，即無從斷定郭高兩氏的表孰真孰偽（郭表與高表都有顯而易見的錯誤，如郭表「卜辭王氏考」項下祖辛子誤作祖弟子，小辛弟誤作小乙弟是；而高表殷本紀項下則將祖乙子誤作祖乙弟）不過就全體講，兩者都不會有什麼大錯誤。茲借用高先生的殷代世數異同表，而去其三代世表和古今人表兩項，並改正一處錯誤和排列法如下：

史記與卜辭中的殷代世數異同表：

| 帝 | 名  | 殷 | 本 | 紀   | 卜 | 辭 | 所 | 有 | 補 | 注      |
|---|----|---|---|-----|---|---|---|---|---|--------|
| 一 | 湯  |   |   | 主癸子 |   |   |   |   |   | 一<br>世 |
| 二 | 大丁 |   |   | 湯子  |   |   |   | 全 |   | 二<br>世 |

|     |     |     |     |     |     |     |     |     |
|-----|-----|-----|-----|-----|-----|-----|-----|-----|
| 一   | ○   | 九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 中丁  | 大戊  | 雍己  | 小甲  | 大庚  | 沃丁  | 大甲  | 中壬  | 外丙  |
| 大戊子 | 雍己弟 | 小甲弟 | 大庚子 | 沃丁弟 | 大甲子 | 大丁子 | 外弟丙 | 大丁弟 |
| 全   | 大庚子 | 全   | 全   | 大甲子 | 全   | 全   | 全   | 全   |
| 六世  | 五世  |     |     | 四世  |     | 三世  |     |     |



|    |    |  |     |     |  |     |
|----|----|--|-----|-----|--|-----|
| 二九 | 大丁 |  | 武乙子 |     |  |     |
| 二八 | 武乙 |  | 庚丁子 | 全   |  | 十四世 |
| 二七 | 庚丁 |  | 廩辛弟 | 祖甲子 |  | 十三世 |
| 二六 | 廩辛 |  | 祖甲子 | 全   |  |     |
| 二五 | 祖甲 |  | 祖庚弟 | 全   |  | 十二世 |
| 二四 | 祖庚 |  | 武丁子 | 全   |  | 十二世 |
| 二三 | 武丁 |  | 小乙子 | 全   |  | 十一世 |
| 二二 | 小乙 |  | 小辛弟 | 全   |  | 十世  |
| 二一 | 小辛 |  | 盤庚弟 | 全   |  | 十世  |

|    |    |     |
|----|----|-----|
| 三〇 | 帝乙 | 大丁子 |
| 三一 | 帝辛 | 帝乙子 |

我們試將上表看一下，便可以知道鋤頭考古學所誇示的卜辭把史記殷本紀所載的帝王名稱完全批准了，即他們的世系也相差甚微。由此可以證明史記確是一部信史，並非「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史」也不是經不起「鋤頭考古學」的試驗的。試問那些疑古大家，疑古專家，或掛起招牌疑古的「學者」對於此事作何感想？堯舜是「無是公」，「烏有先生」禹是「天神」商代是新石器時代，是牧畜和母性中心的社會這一類無稽之談，在史記和其他古籍的面前，一齊受着死刑裁判了！

當然，我們並不主張史記一取得信史的資格，即完全沒有一點錯誤，完全可靠，但在大家沒有發見確切證據之前，不應當信口開河地一律把牠推倒或抹殺。因為顧頡剛先生在「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史」這頂大帽之下推翻堯舜禹郭沫若先生在「鋤頭考古學」這個金字招牌之



下抹殺商代的田野農業和父傳子的專制局面，不獨不能建設信史，並且恰恰背道而馳。這真是「不惟無益，而又害之！」我們既經證明史記股本紀所載自湯至武乙的世系真實可靠，便沒有理由說同紀中所載自契至湯的世系不可靠也。同樣沒有理由說夏本紀所載自禹至桀的世系不可靠。我們于史記之外，再考察其他古籍，明白看見唐虞夏商之間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絕大的轉變點：用中國的老話來說，在唐虞之世是傳賢之局，一到夏商，便是傳子之局（偶然為兄終弟及）；用考古學的知識來說，在唐虞之世是男性本位的社會，即氏族社會的末期，一到夏商，便入于文明時代，階級制既出現，而國家也成立了。我們對於夏商的傳子之局，不認為男性本位社會中的現象，而認為階級制和國家成立後的社會中的現象，因為會長的傳子是要經過全氏族人員民主主義的選舉，而君主制的傳子僅由于君主一人的意志，民衆絲毫沒有置喙的餘地。我們把史記和尚書聯合起來看，便十分明白。基于這種理由，我特拋棄參戰論文中盤庚以前為氏族社會末期的錯誤主張，而認為氏族社會的末期，夏為階級制和國家出現的時代。至于詳細事實，已見于此次新增的二萬餘字中，茲不再贅。

我既說出上面的大理由，這種主張也許容易爲人們所接受。不過成見是最害死人的，尤其是一班所謂「學者」和「名人」，爲維持自己的「權威」或「威信」起見，常思盡方法去保持他們的成見；因此我不相信那些盲目的疑古家和近來許多「研究有得」，「言言殷或西周爲氏族社會末期的先生們，會贊成我的主張。我竭誠歡迎他們盡情反駁，因爲我這一次也許仍舊和上次一樣，沒有闖進真理之門，不過希望預備反駁的人做到下列兩點：

一，用鐵一般的證據推翻夏本紀和殷本紀的世系表。

二，用鐵一般的證據推翻尚書堯典，舜典等篇關於堯舜「咨四岳」，「咨汝二十有二人」這一類民主主義的事實和甘誓，湯誓，盤庚上中下等篇關於專制君主發揚專制主義的事實。

他們如果不在這兩方面做工夫，僅自欺欺人地舉出一些不相干的理由，便不能推翻我的主張，更不能使我放棄我的主張，這是我預先聲明的。

我深自慶幸，能衝破十幾年來盲目的濃厚的疑古空氣，而達到一種切合中國古代史實和

西洋考古學規律的結論。內中也許還有應當修正的地方，但我此時的自信，大體是正確的。我劃分中國經濟發展的時期是以生產方法為標準，唐虞以前的氏族社會為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是不成問題的，但夏殷怎樣呢？我的答案仍是亞細亞的生產方法。

這個名詞是馬克思于一八五九年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中提出的，郭沫若先生曾經很不正確地把牠看做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已被我駁斥；而我把牠應用在殷代，又引起胡秋原先生一篇四萬字左右的反對論，笑我不該「旋乾倒坤三千年」，將牠安置在殷代。同時杜畏之先生在我發表第一次參戰論文的同时讀書雜誌中，刊佈他的古代中國研究批判引論，力言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亞細亞生產方法。但我看過他們的論文後，不獨沒有拋棄自己的主張，並且還把這種生產方法同樣應用於夏代。在一方面，我對於杜先生所提出並否認其曾經存在于中國歷史上的「東方社會」或亞細亞生產方法底下的六個特點，一一以答覆，指出牠們確切存在于夏代，並指出這種生產方法在夏殷兩代出現的原因。在另一方面，我用八萬字的長文反駁胡先生的偉論，附在本書後面，內中對於亞細亞生產方法所闡揚的文字，自然是參戰

論文中所沒有的。

我所認識的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法，和胡秋原先生所稱的「俄國有名的農業問題理論家」杜布洛夫斯基，「俄國有名的歷史家」波卡諾夫，以及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馬札亞爾等等是不同。他們都認馬氏指此爲近代中國和印度的一種生產方法，我則認他爲指古代印度及東方其他的各國一種生產方法，如涉及近代，便是指這種生產方法的殘餘。詳細理由已見于我的反駁文中。現在要說的一個要點是：馬克思所謂「就大體講，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可以稱爲經濟的社會結構相連續的時代。」正是依照他所最崇拜的大宗師黑格爾所提出的亞細亞的古代的，中古的和近世的世界劃分而作成的。即此一端，已足證明他的意旨中的亞細亞生產方法是古時候的而非近世的，何況我還舉出他親口說出的其他無數理由啦。我自信對於他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法有充分的認識和正確的應用。凡以對我的見解的人，希望對於我所舉的一切理由，詳細加以反駁，勿徒躲在外國「有名的」人的背後，發幾句空議論來否定我的主張。

關於封建的生產方法，我按照馬克思等的說法，提出一個具體的標準。這是最重要的。因為國人認兩三千年來的中國為封建社會，是由于對封建制度的界說沒有弄清楚，以致把這種制度當作一件寬袍，可以加在任何社會的身上。我于提出這個標準之後，對於陶希聖先生所說的中國封建時代下過無情的攻擊；他新近雖改變了主張，但我的反駁的議論絲毫不失去現實的意義，因為陶先生把西周看做氏族社會的末期，三國到唐末五代看做發達的封建莊園時期，和真理相去愈遠了。他要想維持新近的主張，須努力破毀我所提出的標準和我對他的批判。還有一層，最近出版的俄國沙發諾夫所著中國社會發展史，是有五百六十頁。譯者李俚人

先生雖稱作者「對於中國社會之史的發展却有深刻的研究，他曾以半生的精力耗費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籍裏，」並「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唯物的辯證法，來探討中國社會的發展。」見沙氏中國社會發展史譯者序言一頁。但自我看來，這是一部最糊塗昏亂的著作。他說：「商朝——牠替換了夏朝——國土不過十方里，而周朝——牠消滅了商朝——則僅僅七方里。」見尚書五三頁。我們且不去管牠，他對於中國的氏族社會沒有指出終止期，對於中國的封建制

度也沒有指出起源期。他一說方面從秦始皇「時起才開始中國固有的歷史」（見同書一三頁），另一方面又標出「周朝封建制度」的名目，並說明「封建的無政府是從春秋時代起」（見同書三七頁）。最荒謬的是他對於漢代的制度絲毫不加證明，乾乾脆脆地認為封建制度，並且說：「漢朝之更替秦朝，這是中國封建制度走上自由發展之路的一個最大轉變時期。」（見同書一五二頁）從此以後，在漢朝則有「中國的封建」「帝國主義」（見同書二三五頁）在「唐代是中國封建制度表現軍事勇氣最不多見的時期之一」（見同書三一五頁），在宋末是「金銀的紊亂，隱藏着中國的新封建化」（見同書二六九頁），在明代是「商業又穿上了封建的衣服，」「是中國封建制度的復興」（見同書四三五和四三七頁），而太平天國也是「模仿封建官僚組織。」（見同書五〇二頁）

總說一句，沙發諾夫這部書對於中國的封建局面的說法不獨不比陶希聖先生從前的主張為高明，並且還更糊塗昏亂，因為沙氏在任何制度之上，在任何事件之上，都可一律加上封建兩字，除掉上面的例子外，還有滿洲人「尚保持封建氏族組織。」（見同書四六一頁），「明代

這些國有土地大部分分配給王侯，皇室的親族，僕役，宦官，國有的寺院，及邊境的官吏和兵士去了，「國有的農莊容易變爲私有的農莊，這是中國封建制度的弱點和我命湯」（見同書四三八和四四〇頁），這些話是明白承認把土地分賜臣下，就是封建。自沙氏看來，世界上是無物不封建，無人<sub>不</sub>封建，也無時<sub>不</sub>封建，所以把土地分賜臣下固然是封建的，商業也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固然是封建的，氏族組織也是封建的！他忘記說，或在這部書中不必說的惟一事件是：

在他所住的俄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而這社會主義，不用說，也是封建的！  
騎獸休哉，氏族組織的封建，商業的封建，帝國主義的封建和社會主義的封建！

我們貴國人素來具有「洋迷」之癖，這個「俄國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所著的中國社會發展史，不知道又要陷害多少青年學子故特乘便提出來，概括批評一下，同時並聲明我對於陶希聖先生說的封建制度的批評，有許多是可同樣適用於這個「中國通」的主張的。當然，單靠這些實在不夠，將來有工夫的話，我對於這部書和其他許多封建長封建短的書籍，將下一次更周密的總攻擊，本書對於陶先生的批評，不過是其發端罷了。

我所認識的中國過去經歷的生產方法，封建的生產方法之後是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關於這種生產方法，我在本書第三項和反駁胡秋原先生的論文中，說得最詳細，讀者一經披閱，即可瞭然。不過這裏有一點是要聲明的。王禮錫先生在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之謎的時代一文中說：

「第一，我覺得「前資本主義」的術語過于含混，不能很明白的表示這一時期的社會的特質。

「李先生所引證的兩段資本論：

「前資本主義的民族的諸生產方法的內部堅實……」

「重利盤剝在一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中發生革命的影響……」（讀書雜

誌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二輯李文四六及四八頁）

「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前都冠以「諸」或「一切」，可見馬克思並不以「前資本主義」當作一個時期看，也不當作一個生產方法看。



「第二，李先生所認為前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小農與手工業的直接結合」這一點，是根據馬克思「這些國家生產方法廣大的基礎，是由小農業與家庭工業聯合構成的」的話來的。却是馬克思所說的「這些國家」是指前資本主義的「諸」生產方法的那些國家。封建的生產方法不也是「諸」生產方法之一種嗎？杜布洛夫斯基則正以這個特徵加之封建制度之上，所以李先生對這個時期所用的術語，這是以混淆他對這時代的特質的認識」（見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說第三輯王文一四頁）

王先生這幾段話是由于我從前徵引資本論的數節而沒有精密恰當解釋所引起的誤會的結果。當本書付印時（在王文發表之前），我已經把自己的說明加以修改和增補，使徵引文的原意得完全顯露出來，不致再引起誤會。現在要簡單答覆王先生的，是統觀馬克思的著作，凡泛指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方法，即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這個名詞變成多數（我因中文表現不出來，故代以「諸」字）有時且冠以「一切」的形容詞，凡專指真正的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則這生產方法的名詞必為單數而非多數。即以王先生所指出的一段話為例，原

文起首數句是：

「前資本主義的民族的諸生產方法的內部堅實，對於商業解體的作用所表現的障礙，可以從英國對印度和中國的通商明白表現出來。這些國家生產方法廣大的基礎，是由小農業與家庭工業聯合構成的……」

這裏第一句的生產方法，原文爲多數，而第二句的生產方法，原文爲單數，正是上述區別的明證。馬克思在第一句中是泛指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方法內部堅實足爲商業所發揮的解體作用的障礙，自確切指定印度和中國做例子的時候，即馬上將生產方法換成單數，敘述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殘餘，即狹義的（爲便于區分起見，特指前者爲廣義的，後者爲狹義的）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一部分。其他例子尙多，已詳本書，不再重說。所以廣義的前資本主義的諸生產方法與狹義的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兩樁事，不是一樁事，後者有一定的內容，並不與前者相混。因此我對於這個時期所用的術語，決不致混淆我對於這時代的特質的認識。

王先生因上述的誤會，拋棄前資本主義的術語，另採用潑可老夫斯基解釋俄國歷史所提

出的「專制主義」的名詞來解釋中國自秦漢至清鴉片戰爭前「這一段謎的歷史。」（見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王文二〇頁。）我對於這一點是不贊成的，一因狹義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術語最切合這個時期的狀況，用不着另立新名目，二因劃分經濟發展的時期，應以生產方法為標準，「專制主義」不是一種生產方法，只是某種或某幾種生產方法所產生的一種現象，絕不適用。王先生對於我上面的解釋和這裏的批評也許能夠接受，仍回轉去應用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術語，不致感覺中國這個時代是「謎的時代」罷？

不過說到這裏，我還要提出一個報告，就是當馬克思指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方法時，常用「前資本主義的諸生產方法」字樣，當他指狹義的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就我所知，沒有冠上「前資本主義」的形容詞如前述一段，就是一例，此外，資本論第三卷「前資本主義的」一章，例子尤多。如果他在別處曾經用過這個形容詞，尚未被我發覺，那自然沒有問題，否則這一點將被人們作為口實，說所謂狹義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術語，並非出于馬克思，不可運用。

我以為馬克思于指狹義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時，僅用單數的生產方法，而不冠以「前資本主義」的形容詞，是由于沒有必要，並非不承認這樣的一種生產方法。例如在上面所徵引的一段話中，他既于第一句用過「前資本主義」的形容詞，第二句自然不必再用。又他在「前資本主義」的一章中，既用過這樣的總標題，文中也自然不必重用。總之，馬克思所指的狹義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有一定的內容（已詳本書），絕不能因他沒有將這個術語連貫起來，遂被人們拋棄不用。

現在即退一萬步，假定馬克思沒有將前資本主義與單數的生產方法連貫起來，是不願意提出這個術語（這自然是千萬不會有的事，否則「前資本主義的」一章大可作廢了），然我為說明自秦漢至清鴉片戰爭前的經發展狀況起見，也有權利創造這個術語，拿來應用。德國著名的經濟學者桑姆巴特著近世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mus*）四厚冊，敘述歐洲自八世紀至十九世紀的經濟制度他認全歐洲經濟史上的早期資本主義（*Frühkapitalismus*）時代，就廣義言，是自十三世紀中葉起至十九世紀中葉止，就狹義言，是自十五世紀中葉

起至十八世紀中葉止（參看該書原文第二卷第一冊一四頁）。自八世紀至早期資本主義以前的時代為前資本主義的時代，所以他的書第一部分的大標題為「前資本主義的經濟。」（Die Vorkapitalistische Wirtschaft）不用說，這裏所謂「前資本主義的經濟」是單數，而不是多數。其實在資本主義的前夕所表現的一種過渡而複雜的生產方法，稱之為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再適當也沒有了。所以無論如何，我對於中國自秦漢至清鴉片戰爭前的生產方法是要採用這個名詞的。

有人以為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既是一種過渡的生產方法，為什麼佔這樣長久的期間？但我們應當考察自秦漢至清鴉片戰爭前是否確係實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不必去問期間的長短。當中國周代的封建制度崩潰五六百年之後，歐洲大部分人（除希臘人和羅馬人外）猶在野蠻狀態之中，他們達到封建生產方法的階段既較遲，而進入資本主義又較早，所以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佔的期間當然較短。反之，中國的文明發達較早，在紀元前一一三四年至二四七年已是封建生產方法興起至消滅的時代，自此以後，因生產力的不發達，兩千年中使停

滯在前資本主義的階段而不能進展，故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佔的期間特別長久。

然許多討論中國問題的人對於自秦漢至清鴉片戰爭前這個長時期，分成幾個性質截然不同的時代。如王宜昌先生把：

- 一、秦漢看做奴隸制度的時代，
- 二、五胡十六國至清末看做封建制度的時代。（參看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王文一三，一四和一八頁）

又如陶希聖先生最近把：

- 一、戰國至秦漢看做奴隸經濟佔主要地位的時代，
- 二、三國至唐末五代看做發達的封建莊園時代，
- 三、宋以後至清鴉片戰爭前看做前資本主義的時代。

（參看同書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陶文五至七頁）

于陶兩先生發表此等主張既不過幾段話，沒有多少事實作內容，我們自無從加以詳細的

批評，而且此處也不是詳細批評的適當地方，所以我只能概括地說幾句。

中國自秦漢以後，因產業——特別是因商業——的發展而產生大量的奴隸，這是事實。但絕沒有形成古代希臘羅馬那樣的奴隸制度，因此在經濟中也絕沒有佔主要的地位。在這兩千年的經濟中佔主要地位的是農工業直接結合的半封建的小農生產。至于完整的封建制度，在這個長時期中始終未嘗出現過，無論五胡十六國之亂或蒙古人的侵入是怎樣破壞了中國經濟制度，或怎樣企圖「恢復封建制度」，但這種制度的基礎已被商業蝕毀，單靠政治的力量是「恢復」不來的，至多不過達到一種半封建，或封而不建的局面罷了。然說到這裏，也許要遭王先生的呵斥，因為他早已說過：

「有人以為封建社會，中國在秦以前便沒落了。這不過是從中國古代使用的「封建」二字，和現譯的 *feudalism* 的「封建」相混之故。這種不究內容，只看字面的，不值一說。」

（見同書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王文七頁）

王先生雖也時常反駁郭沫若先生的主張，但也有接受的地方，他在最近發表一文中認為

「殷代是金石並用時代」（見同書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王文二八頁）就是一個顯例。這裏所謂「中國古代使用的「封建」兩字」的意義如果是和郭先生在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當中所說的一樣，那我已經批駁過，用不着他再行聲明。否則我真不懂周代的封建制度和西洋的feudalism有什麼不同，非請教王先生不可，這是值得他一說的。我自己現在要饒舌的是，中國古代的所謂「封建」或封建制度雖帶着濃厚的政治色彩（「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乃祭建親賢，以屏藩周」）但究其內容，這就其說，究其經濟狀況，與西歐中世紀的封建制度沒有什麼大差異。所以無論是中國古貨的「封建」或從feudalism譯來的「封建」，在秦漢至清代沒有表現過。在這個長時期中，雖因內爭與外患（胡人的侵入）幾經變亂，使當時的經濟受到重大的打擊，而呈出退化的現象，或因累世承平，產業發展，而呈出進步的現象，然這只是程度的問題，于生產方法的性質絕無變更。因此我們始終認這個長時期是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而不贊成有其他的劃分。

繼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而起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關於這種生產方法在中國的



應用，我更要說幾句話，而其主旨不外下列兩點：

一、將這種生產方法應用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是否適當？

二、如果適當的話，是否應從清朝鴉片戰爭時，即一八四〇年算起？

自我提出這種主張後，雖還沒有遇到批評，但我知道有許多人是不贊成的。例如陶希聖先生最近發表的一篇短文雖承認一八四〇年以前是前資本主義時期，自此以後，他就表現一種徬徨的態度了。所以他說：

「自一八四〇年以後，中國受工業資本主義的克服，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已經不能依然照通常的社會發達過程前進了。」（見同書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陶文七頁）

這話雖一點也沒有錯，但中國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仍舊有華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在國內立下根基，由發生而至于發展，並逐漸取得支配全國產業的地位。牠的唯一的特点是這種生產方法因外貨輸入的壓迫，不能充分發展，而且不是純粹民族的資本在那裏統制生產進程。然無論如何，這到底還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而不是一種本質不同的半殖民地的生產方法。

所以我們用不着另立新鮮名目，也用不着懷疑，而不採用這個名稱。

第一個問題雖經解決，然我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從一八四〇年算起，一定又是許多人所不贊成的。依他們的意見，以為這是太早，應當退下七十年，從民國元年算起。但照我的初意，與其說是太早，毋甯說是過遲。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桑姆巴特認十三世紀中葉或十五世紀中葉為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的開始期，就是馬克思也說：

「當十四五世紀時，資本主義的生產的初步雖已在地中海好些城市中零星出現，然資本主義的時代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的。」（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原文第一卷六四七頁）

這句話至少要使那個絲毫沒有科學常識，專靠抄書來著書，而新近又被胡子先生舉發為「戰場上的漢奸」的朱其華大吃一驚，因為他在一部五百多頁的厚書中神氣十足地說：

「不能因為李鴻章在上海辦了一個機器紡織局，就說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

（見朱其華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四六〇頁）

其實只要有私人資本所組織的大規模的協作生產出現，就算是資本主義的時代，所以馬克思說：

「和我們曾經看見的一樣，在私人資本同時雇用一種數目較多的工人從事工作，使勞動進程擴充牠的範圍，並且產出數量較多的生產物之處，在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生產才開始。」（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原文第一卷二六九至二七〇頁）

他又說：

「協作的、純單形態本身雖伴着牠的更發達的諸形態而出現為特別的形態，然協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本形態。」（見同書同卷二八三頁）

這些話就是說明資本主義的開始期並不以機器的生產為條件，所以馬克思指機器出現一個半世紀以前（機器出現于十八世紀下半期）的十六世紀為資本主義的時代。當時自然連李鴻章在上海所辦的機器紡紗局的影子也沒有，這雖不合于「以世界革命家自豪」的朱大漢的「理論」，然却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結論。

基于以上的理由，我特把一八四〇年到現在的中國劃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時代。經過上面的說明，總可以消除一般人的誤會與疑慮，以為只有像歐美日本那樣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才配稱為資本主義時代，半殖民地的中國是不夠資格的。

我將近二十年來學術界信古疑古風氣的變遷，整理國故派和新思潮派建設信史的工作，自己對牠們的爭鬥，最近重新劃分古代社會時代的原因，以及對各種生產方法和主張的意見等等說完之後，特提出論戰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來討論一下，就是參戰者的態度問題。當九年前張君勸先生所代表的玄學派與丁文江先生所代表的科學派大張旗鼓，在各種報章和雜誌上作戰的時候，梁任公先生即提出兩條「戰時國際公法」道：

「第一：我希望問題集中一點，而且針鋒相對，剪除枝葉。倘若因一問題引起別問題，當可別為專篇，更端討論。」

★

★

★

★

「第二：我希望措詞莊重懇摯，萬不可有嘲笑或謾罵語。倘若一方偶然不檢，也希望牠

方別要效尤。」（見科學與人生觀上冊梁文二至三頁。）

第一條此時不講，專講第二條。梁任公先生是個資產階級的學者，而雙方參戰的人員也多屬於這個階級。誰都知道，這個階級的學者或文人常保持，或力求保持一種紳士態度，因為他們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他們的言行是要樹立風聲，為人表率，所以他們在複雜的環境中，經過千錘百鍊之後，還只剩着一種矯揉造作的虛偽態度——即紳士態度。自梁先生這種「公法」宣佈後，附和者實繁有徒，而唐鉞先生（參看同書下冊唐氏玄學與科學論爭所給的暗示二至三頁）和范壽康先生（參看同書下冊范文二二至二三頁）就是兩個顯例。

一個人本來具有喜怒哀樂愛惡欲這一類感情的，起來參戰又是動感情的事，所以于埋直氣壯的時候，偶然來一套嬉笑怒罵的頑意兒，既使文章生色，又可以發舒胸中的感情，這本是再自然也沒有的。不意這些學者或文人竟公然出來加以限制，叫人在打仗的時候，不必盡自己的本領打去，要處處依照他們的方式進行，這是何等惡作劇的事！

然提出公法第二條的梁先生自己，和人家論戰真是不動感情的麼？不然，大大地不然。我們

試聽他說：

「存君和君勳交誼不同尋常。他們太相熟了，脫略形跡慣了，每見面必談，每談必吵，每吵必極談，極談有極意。這是我常常親見而且極愛慕的。他們無論吵到怎麼田地，再不會傷私人感情，我是敢下保證的。但「著諸竹帛」的文章到底和隨便談有點不同。況且這回論戰題目太重大了，行文更要格外勤懇鄭重。否則令人看作遊戲文章，便會把原來精神失掉大半。再者，我希望這回論戰能做往後學同上乃至其他主義上一切論戰之模範。所以「磨鍊」「詭辯」「憤爭」的態度務要剷除淨盡」（見同書上册梁文三頁）

梁任公先生是一個老練而巧妙的文章家，更是一個紳士態度的代表人物，他上面一段話不用說，是經過渾飾的。然即此可以看出他在實際上對於別人討論問題，大動感情，不獨不討厭，而且極愛慕。只因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處處要顧慮到示人以「模範」才叫爭論的雙方。只可在言談上動感情，並且無論怎樣大吵大鬧都可以，但是——但是不可見諸筆墨啊，資產階級學者的虛偽，真是登峯極造了！

這種虛偽的態度，我們是不能容忍的。豈止我們，就是他的同階級的人現在也不能夠容忍了。不信，我可介紹今日（十二月五日）申報自由談的編輯先生的兩小段話如下：

「樂到極點，便『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真情之流的自然流露，確是這樣不容遏制的。同時，假若外界給予人們的刺激太深，則爲刺激所掀起的強烈的反應，也會使人情不自禁地頓足錘胸，逼得非罵不可。」

「但拿偽君子的眼光來看，罵是頂野蠻不過的，他們雖則背着背良心，幹了不少損人利己的壞事，表面上却滿口甜蜜，企圖不露半點兒痕跡，誰若要鳴不平，想把心中淤積的憤火發洩發洩，不管你心直口快，句句是道，他們總極力反對，不嚴加干涉，處于這時代，偽君子的權威高壓在他入之上，所以入的真情，竟然多少被兇鋒掩蓋住了。」

當然，自由談的編輯先生這些話不是對梁文而發，不僅這樣，他如果知道我徵引他的話去和任公的話對比，即不致「情不自禁地頓足錘胸，逼得非罵不可」，也要「心直口快」地說一句「豈有此理！」然無論如何，上面這些話總算是替罵入的人吐了一口怨氣，這才是「真情之

流的自然流露。

本來抱有紳士態度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們既表現一種不復維持口是心非，表裏不一致的虛偽態度，而生活與習慣都浸潤在爭鬥的青年們更是如此。所以讀書雜誌的編輯先生很鄭重地說：

「我們這個刊物不取教科式的呆板的敘述的方式。裏面的文章很少莊嚴的教學式的臉孔。他們不掩蓋相互間的矛盾，他們不顧相互間的紳士或學者的面子。他們是像有生氣的青年一般，一點都不「世故」三句不對就吵起來。如果作者怕損了自己的學者的尊嚴，頂好不在這裏發表文章。如果讀者不慣于這種潑刺的習氣，頂好不讀這裏面的文章。」

（見該誌第二卷一期卷頭言）

拿這些話和梁任公先生的話來比較，大家可以看出這不是一種墮落而是一種上進，不是一種虛偽的延長而是一種虛偽的打破。要做到這一點，才能夠使參戰者依照自己的個性和體裁，放手做去，而不致因時時要顧慮到保持一種虛偽的態度，反失去作文的自由。馬克思從前



在評普魯士新近的檢査令一文中說過：

『我的所有物是體裁，體裁是我精神上的個性。體裁像入(Le style c'est l'homme)怎樣呢！法律准我從事著作，但我當拋棄我的體裁，另用一種體裁去從事著作！我可以表現我精神的面目，但我預先必須將這種面目套在規定的縲皮裏！那一個有體面的人對於這種不合理的要求，不覺得忸怩，而不情願將他的頭藏在寬袍裏面呢？至少讓寬袍像一個約彼特的頭 (Jupiterkopf) 那些規定的縲皮不過是使好好的姿容變成惡劣的滑稽像罷了。』(見馬克思與昂格思文匯原文第一卷一四五頁)

這段話不獨是對檢査令的一種有力的抗議，並且也是對資產階級富有紳士態度的學者們限制參戰者措詞必須「莊重」，「萬不可……嘲笑」，並且要把「虐諛」，「憤爭」的態度「剷除淨盡」的「公法」的一種有力的抗議，所以我特把牠介紹出來。

現在我要講自己作戰的態度了。我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戰士，對於我的論敵常喜用勇猛決切的戰術，以期馬上分出勝敗。我曾在拙著我的生平序言中談到批評適之先生的實驗主義和

## 中國哲學史大綱，說我

「有時且出以一種嬉笑怒罵的態度。這不是我故意與之爲難，實因我是一個戰士，非採取這種態度，卽不能發洩胸中的熱情，增加文字的力量，引起讀者強烈的注意，並促進他們深刻的認識。」

不用說，我是破壞了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戰時國際公法」，「拿破侖君子的眼光來看……是頂野蠻不過的。」但我並不以此事爲榮幸，惟有喟然而嘆曰：予豈好嬉笑怒罵哉？予不得已也！現在暫且拋開這一點，打個譬喻，大家當能知道我的苦衷。今有一所建築多年或新近建築的房子于此，因爲矗立途中，阻礙我們的進步，命我去折毀，我當使用剛刀，還是使用竹刀，當使用鐵錘，還是使用木錘？只要不是瘋子，誰都會贊成我使用剛刀與鐵錘去作工。既是這樣，難道大家贊成我用最有效的工具去折毀妨礙進步的房子，而反對我用最有效的武器去掃除我的論敵自成系統的謬誤的議論麼？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只好袖手旁觀，不起來作戰。因爲我既爲戰士，卽有戰士的熱忱，戰士的勇氣，與戰士的策略，現在爲着保持一種紳士態度——卽僞君子態度——的

緣故，要壓下我的熱忱，消滅我的勇氣，破壞我的策略，那我除掉一交戰就變成敵人的俘虜或可恥的逃兵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如果拿馬克思的話來說，我除掉把我的精神的面目套在規定的繃皮裏，使好好的姿容變成惡劣的滑稽像以外，還有什麼辦法？這一大段話就是我不願意嬉笑怒罵，而又不得不嬉笑怒罵的最大的理由。

我對於中國學術界的先進如梁任公，胡適之諸先生既不避去這種態度，在同輩人的面前更用不着裝出我本來沒有的紳士態度。我在這一次中國社會史的討論戰中對於敵軍或友軍多所接觸，詞鋒所至，傷人頗多，於是陳邦國藉王禮錫先生在論戰第二輯序幕的附啓中說我「準備在論戰的每一輯上攻打一個戰場上有權威的人」一句話來反詰我：

「試問：如在某一輯論戰上沒有個有權威的人時，雖或有個有權威的人，但其沒有錯誤處時，難道李君還是要「在論戰的每一輯上攻打一個戰場上有權威的人」嗎？這樣，那除了「斷章取義」強人錯誤之外，是不會有第二法門的，但這是什麼「批評」呢？」（見

讀書雜誌論戰第三輯陳文二二頁）

關於陳某反駁我的地方，已在駁胡秋原先生的論文中附帶答覆。我曾鄭重聲明，就陳某近兩三月來「君子豹變」的態度與立場講，我不屑再和他討論，不過爲着胡先生的緣故，不得不連帶說一說。這裏又提起他，實因我要說明自己作戰的策略，無法避免他。

我在戰場中對於兩種人，特別進攻得厲害：一種人是所謂著作界的權威，一種人是自己毫無所有，偏又以狂妄的態度，亂發議論，淆亂聽聞。一種人以其大批不正確的著作散佈于社會，使一般青年學子受害無窮，如顧頡剛，郭沫若，陶希聖諸先生是。所以我不得不破除情面，挾着鋼刀與鐵錘，折毀他們好幾年來盡心建築的精神上的房子，把禁錮在裏面的青年們拯救出來，至于在私人方面，我對於他們是毫無嫌隙的。他們如果誠心誠意地爲着真理而著書，此刻覺得我的批評對，應有勇氣起來接受，不對，儘可痛加反駁，總不至因此懷恨我罷。假如不幸真有這種結果，那我爲青年學子的利益計，也只好不管了。後一種人完全是戰場中的投機分子，挾着一點東抄西湊，錯誤百出的東西，來攻擊他人，如朱其華，陳邦國之流是。尤其是陳某，把氏族社會從原始共產制或原始共產社會中開除出來，以此標準去攻擊郭沫若先生，說他「鑄下了大錯，實在不

特是大錯，簡直是個大笑話。」這經我力加指摘，陳某近復用文過飾非和強詞奪理的手段來反駁我，（我的答覆見本書附錄駁胡秋原先生一文的第四項中。）我對於此等投機分子，常願拿一二個來痛加懲創，藉以肅清戰場上無用的廢物，使雙方的主力戰馬開始，並早日分出勝負。這種人我是不怕他們懷恨的，因為我即一百二十萬分地對他們客氣，就他們所表現的行爲看，也是要用明槍暗劍來對付我的。何況我爲着真理而作戰，一面是不知道客氣的。以上是我心坎子上的話，老早就想宣佈出來，因沒有機會而未能吐露的。

這段話總可以表見我作戰的態度雖勇猛決切，但同時是十分坦白的。葉青先生以很懂世故和策略的心情忠告人們說：

「這·個·也·反·對·，·那·個·也·反·對·，·是·自·陷·重·圍·底·辦·法·」（見二十世紀第一卷五期六頁）不用說，我現在是孤軍獨戰，「自陷重圍」中。但馬克思說得對：

「真理的不謙遜恰和光線一樣，真理常謙遜，為的是誰呀？為的是牠的本身麼？真理是牠自身及錯誤的表現。因此為的是非真理麼？」（見馬克思與昂格思文匯原文第一卷一）

## 四五頁)

我們要參戰，免不了要反對這個，反對那個，也免不了要把光線一般的真理很不謙遜地射入敵人的陣地，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也是不應當避免的。所以我陷在重圍中只有兩種結果：一種是我作戰的武器係真理，我可以仗着這種不謙遜的真理擊敗我的重重圍困的論敵，而獲得勝利；另一種是我作戰的武器並非真理，于一度開火之後，因器械窳敗，被堅甲利兵的敵人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塗地。到底那一種結果會出現，時間是會裁判的，此刻不用多說了。

我挾着不謙遜的真理作批評的武器，于論戰的前途實有莫大的利益。據兩位友人負責告訴我，胡秋原先生因我在批評陳邦國的一段文字中偶然提及他稱贊陳某一文的話，遂「竭三日之力」草就一篇四萬字左右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來反駁我在參戰論文中所描寫的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法說。我因答覆他起見，也草成一篇八萬字的長文，附在本書的後面。這樣一往一來，戰局便展開了，而並且是向着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展開了。假使我從參戰初時起，就滑頭滑腦，對這個也逢迎，對那個也敷衍，那我於處世的方法可稱是「到家」了，但把真理犧牲在八

面玲瓏的應酬中，不獨于論戰絲毫沒有益處，而且也是我所極端鄙視的。這樣看來，認真批評，毫無顧忌的批評的結果，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胡先生于他的大文還沒有開始之時，即預先聲明「不諱言」自己「對於政治經濟是外行」，這當然不能不使我們拜服他的態度的坦白。但像這樣的專門題目，普通經濟學者所不能了解的專門題目，自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外行的胡先生竟拿起來做，並做到四萬字左右，這當然又不能不使我們拜服他的態度的勇敢。坦白與勇敢是作戰中的兩個要素，胡先生都已備具，當然可以來大戰一場。不過打開胡先生的大文一看，馬上發見他對於亞細亞生產方法的議論，完全代表杜布洛夫斯基，波卡諾夫，約爾克這一類人的主張。既是這樣，一個「外行」對於一個專門題目做到幾萬字，也不算是奇怪的。但這樣一來，我的迎戰便不能完全以他為對象，所以我的題目不能不稱為：對於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諾夫等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的迎戰。這就是代示「俄國有名的農業問題理論家」和「俄國有名的歷史家」經過胡先生的手來推翻我所描寫的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學說，而我也假手於對胡先生的直接交鋒。

而勇猛地對他們作戰。我是用純客觀的方法，介紹馬克思和昂格思親口所說的話，去擊破他們荒謬的主張與曲解，自信比他們用「分屍評判法」，「人為淘汰法」，「自由增補法」和「矯揉造作法」（參看迎戰一文）所製造的什麼亞細亞生產方式論要真實可靠一點。

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問題，自馬克思以後，在德文中有人提出來特別討論，在英文中更是如此。但在俄文中却不然。列甯和蒲列漢諾夫等在世時已經提及過。及至最近幾年，因俄國方面關心于中國的革命，有許多人專門研究中國問題，遂不得不連帶提出亞細亞生產方法來討論，如瓦爾加，馬札亞爾等等都是。但旋有一個反對派出現，反對亞細亞生產方法為一種特殊的生產方法，如杜布洛夫斯基，波卡諾夫，哥兌斯（M. Godes）等等是。聽說中國的政黨于一九二七的土地綱領中也曾承認這種特殊的生產方法，卒因國際嚴厲的批評，而修改了。近來日本對于俄國這個問題的爭論有許多譯本出現，現在中文譯本也快出版，總不能不算中外學術界一個重要問題了。牠對於東方人和中國人尤有深切的關係，因為馬克思和昂格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法既出現在亞洲，牠的內容怎樣，中國是否經過這個局面？這些問題都是智識界的青



年急欲知道的。

我因看英德文書比較便利，且容易購取，已五六年未曾看過俄文書，也不望一窺日文書，所以對於俄國這兩派對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爭議都無從知道。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我只看見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中文譯本，和路易中國革命與反革命的德文譯本，曾在參戰論文中予以反駁胡先生一方面怪我不該「嚴厲批評……馬爾加（即馬札亞爾）使之」（指亞細亞生產方法）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合而為一之說」（見文化雜誌創刊號胡文五頁）更怪我不該「痛罵馬加爾」（見同書胡文一一頁）在另一方面却說：

「馬加爾等等學說，在中國有兩個優秀的弟子，一個是陶希聖先生，一個是李季先生。」（見同書同號胡文五頁）

把我當作外國「有名的」學者的「優秀的弟子」，我本來是很願意的，不過要和我的主張相同的人才好，否則我不獨不能算「優秀」而且是一個「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的「弟子」。  
胡先生未免太惡作劇了罷！

我在序言中提出這樁小事，似乎近于枝節。其實不然。我的用意是在說明我對於俄國或俄國以外主張特殊亞細亞生產方法的人沒有發生過關係，他們的主張是否正確，是否合乎馬克思和昂格思的原意，應由他們自己負責，誰也沒有權利把我列入他們的「優秀的弟子」之列。使我和他們混在一起，分擔一部分責任。關於這一點，大家還可從我所徵引的書籍反證出來。我對於這個問題，從前和現在一樣，是從馬昂兩氏的原文著作中引出大批的證據，而加以闡揚。我的敘述是否正確，完全由我獨立負責，與馬札亞爾或耶薩諾夫等無關。據我所得的證據，他們都認亞細亞生產方法為近代的一種生產方法（關於耶氏的意見，可參看德文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第一年度第二號三三三和三七八等頁，耶氏馬克思論中國和印度），而我則認馬昂兩氏的原意是指古代而言，如涉及近代，僅指這種生產方法的殘餘。這一勇敢的主張不獨與反對派的人如杜布洛夫斯基，波卡諾夫和約爾克等的議論相反，並且也與主張派的人如馬札亞爾和耶薩諾夫的議論不相容。但我始終維持我的主張，並不是要保持成見，也不是故意立異，而是切合于馬昂兩氏的原意，有他們親口說出來的話做根據。如果有人能徵引他們的話切切實

實反駁我的主張，使我心服，那我會毫不遲疑地舍己從人。爲真理而爭鬥，我不獨具有攻擊他人的勇氣，並且還具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但人們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僅徵引一些經過曲解的馬克思的話，或「俄國有名的農業問題理論家」和「俄國有名的歷史家」的話，甚至於俄國有名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家（指耶薩諾夫）的話來反駁我，只是徒勞無功，不能使我屈服的。至於像胡秋原先生一樣，在一小段話中，用許多很尖刻而俏皮的話譏誚我：

一，「旋乾倒坤三千年，」

二，「無疑錯誤的不是馬克思，」

三，「而每一小學生都知道，耶穌未出娘胎一千多年以前，並沒有盎格羅撒克遜族渡海東來，誓師伐紂！」

四，「李季先生不僅和馬克思開心，簡直要和馬克思宣戰了。」（見文化雜誌創刊號胡文一五頁。）

這樣和聯珠般的大礮，雖放得鎮天價響，何嘗損及我的主張的毫末？

胡先生自言在「病中」，「竭三日之力，以成此篇」（見同書同號胡文第四〇和第一頁）四萬字左右的論文，我雖在健康中，並非僅竭六日之力，以成此篇八萬字左右的論文，而是起碼竭去四個以至五個六日之力才告結束。我既花費如許工夫，便深深感覺論戰中一個大缺點所造成的一種痛苦，這不是關係我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全體參戰員的問題，並且此次中國社會史論戰能否早日終結，全以這個問題是否滿意解決為轉移，因此我又要提出牠來討論了。不過我並不從胡先生的大文開始，還要遠遠地說起。

當葉青先生所主持的二十世紀出到七期的時期，人從北平來告訴我，說「此刊物在該處銷行甚廣，極受一般青年學子的歡迎，他們並且認裏面有你的文章。是真的麼？」我聽到他的話，才知道有這樣一種不登廣告，却又不脛而走之雜誌，經過幾次的探詢，畢竟從老友處借來一分。打開一看，覺得雖比普通刊物要好一點，但主幹葉青先生不獨常是暴露他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列甯主義素養的缺乏（記得他說過，依照馬克思主義講，世間沒有絕對的真理，現在拿二十世紀一查，却沒有查到，但我相信這不是我造的謠言），並且還暴露他的社會科學常識的缺

乏（如「第三階級」、「貴族階級」之類，參看該刊一卷第五期九二和一二三九頁）不過我因著過一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對於他的超過二十四萬字的胡適批判也就發生了興趣，即從頭至尾看過一遍他的批判是否正確，姑置勿論，我只說一說其中的一個大缺點。就是這篇大簡的胡適批判，有些文不對題，這種毛病在講中國哲學史方面，表見得特別明顯。

舉例來說，他在春秋時代底哲學一章，講「哲學底背景」共有八頁，只「附帶地駁胡適一句」（見二十世紀一卷第五期一二九頁），在戰國底哲學一章講「哲學背景」共有十五頁（參看同書同卷第六期二四至三九頁），從沒有提及過胡適先生或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名字，這且不管，不意他講孔丘哲學十大頁，而批評胡著只佔一頁的四分之三（參看同書同卷五期一三〇頁至一四二頁），講「孔丘哲學底解釋者會參」五大頁，批評胡著不到半頁（參看同書同卷同期一四二至一四七頁），講「孔丘哲學底解釋者孔伋」五大頁，僅有二三句空洞話涉及「開山」胡博士」（見同期一四九頁，又參看一五〇頁），于是在章末（指春秋時代底哲學一章）用「然而」一轉，總括道：

「然而我們底胡適，却是敘述得一塌糊塗。我到此也不想多加批評，只望讀者再去把他所敘述底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底第四篇，第五篇，第十篇底第一章翻起看看。究竟他給你說甚麼？摘幾點來說，摘些句來引，摘若干詞語來註釋，摘幾個字眼來講述，就是在哲學史麼？這是諸人皆會的。我若有工夫來抄，可以把中國哲學史上卷寫得比白話文學史還多。」（見同書同期一五三頁）

其他類此之例，觸目皆是，用不着再舉。葉青先生的題目叫做胡適批判，偏又「不想多加批評，『只望讀者』自己去看。他笑胡適之先生不是在著哲學史，我却相信他『是在著哲學史』，因為我們如果把他講孔丘哲學的十大頁中對胡批評一頁的四分之三，講孔丘哲學的解釋者曾參的五大頁中對胡批評的小半頁，講孔丘哲學的解釋者孔伋的五大頁中的二三句話一齊抽出來，再把他講哲學背景的若干頁加進去，便只看見這是一部哲學史或哲學史講義，絲毫想不到這是什麼胡適批判裏面的文字！我若有工夫來抄，可以把中國哲學史上卷寫得比白話文學史還多。」可見葉青先生的真意不在批評胡著，而在和胡著比賽！

像這樣的「批判」決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文化落後的中國一種普遍的原則。不信，請再看周紹濤先生批評杜衍（即郭沫若）先生的大著罷！

「照着他的結論看來，以為王道（即周之統一）的基礎為奴隸制，霸道（即春秋戰國以後）的基礎為農奴制，故以為奴隸制發生于封建制之前，而農奴制發生于奴隸制之後。他的見解適和我相反，我以為奴隸制為封建制度搖動後之產品；而封建制度的發生，即在農奴制發生之際，所以說王道（即周之統一）的基礎為農奴制，霸道之基礎為奴隸制。至若我所解釋的，也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的事實，而加以分析的。杜先生所說的，也有他所引的事實，和其解釋的理論。我對他的，也不敢句句加以致辯，我的目的只以我所根據的事實，發表我個人意見，否認杜先生的根本觀念。」（見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周文三頁）

這段話真令人莫明其妙！不獨什麼王道的基礎為奴隸制或農奴制，霸道的基礎為農奴制或奴隸制的胡說，應列入參昏第二十四章，就是一方宣佈自己的意見和杜先生相反，要「否認

杜先生的根本觀念，「一方又宣佈杜先生所說的根據「事實」和「理論」，「不敢句句加以致辯，也極矛盾的能事。這且不去管牠。周先生于說了這段話之後，便依照葉青先生的榜樣，或「諸人皆會」的本能，開始編講義，編至第十二大頁。才在總結一句涉及杜先生說：

「這樣說來，尤其證明周之王道的基礎實爲農奴制，故杜先生所說西周時代爲奴隸制，是很錯誤的。」（見同書周文一五頁）

周先生說了這句話之後，又開始編講義，編到第九頁，徵引方岳（即陶希聖）先生的結論，才又用一句話提及杜先生（參看同書周文二四頁）自此以後，再來四百講義，然後作出結論，又提及杜先生：

「所以我說：霸道的基礎爲奴隸制，而非杜先生所解釋的農奴制呵。」（見同書周文二八至二九頁）

像這樣編講義式的「批評」，胡秋原先生也是一個好手。他的大文雖名爲亞細亞生產方式論，但我記得最初廣告上的副題爲「評李季君之所論」。這文化雜誌創刊號出版，副題雖已



改爲「正馬加爾，瓦爾加等及李季之所論」但他在文章還未開始的前面小註中特別聲明：「本文評李季者較多。我不諱言我對於政治經濟是外行，……不過見李君文後，覺其過傷武斷，故竭三日之力，以成此篇。然而我要說明一句，我是以自由人愛真理的立場而執筆的；我因爲評錢杏邨君一文被人加上托洛斯基派社會民主派的頭銜，然而如我評錢君一文並不是有考茨基托洛斯基講話一樣，現評李君亦不是有斯大林在講話的似乎要這樣申明，亦可見在中國做人之不易矣。」（見文化雜誌創刊號胡文二頁）

胡先生這段話不獨表見他的大著完全是爲我而發，並且深恐我或他人把紅帽子給他戴，有污他的「自由人愛真理的立場」，所以預先鄭重聲明一下。他在批評我之前的開場鑼鼓既打得如此熱鬧，那麼，這四萬字即不講應盡數歸入批評我的分內，總要針鋒相對地享光三萬字，才像樣子。不意經我精密的計算，我不幸只分得三千多字，而這三千多字中且有八百字全與亞細亞生產方法無關，只是胡先生替曙先生及陳邦國打抱不平，兼替自己洗刷的。（參看同書胡文九，四〇和四一頁）

但大家不要幻想，以為剩下的兩千多字，是真正在批評我，並不如此。內中有一部分是「旋乾倒坤三千年」這一類的讒誚話，有一部分是「優秀的弟子」這一類的「奉承話」，有一部分是「不幸中國讀馬克思很多的李季先生……做了馬加爾的應聲人」（見同書胡文一一頁）這一類的婉恤話，有一部分是「李季先生既讀過了資本論而否認亞洲生產方法為先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是使我非常奇異的」（見同書胡文一三頁）這一類的驚訝話，有一部分是「讀過經濟學批評資本論的李季先生何以有這樣的錯誤，真令人百思不解啊」（見同書胡文一五頁）這一類的懷疑話，有一部分是「為什麼李季先生還在痛罵馬加爾呢？」（見同書胡文一一頁）這一類的責備話，有一部分是「李季先生所發明的亞細亞生產方法既遠及馬克思教義，又違反蒲列漢諾夫學說」（見同書胡文一六頁）這一類的空洞話。除掉這一大套把戲外，胡先生真切切實實提出我所描寫的馬克思的主張來批評的不過兩三處，合計只有幾百字！而這僅有的幾百字不是先把我的主張弄歪曲（如我說亞細亞生產方法與亞細亞生產方法殘餘的區別，他就代為改做亞細亞生產方法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區別，詳情見本

書）再來批評，就是不懂我的原意而信口開河。總說一句，凡他批評我的話沒有一句是站得住脚的，讀者披閱我的迎戰論文，就可以知道。

現在請問高明的讀者，我在上面所舉的三個例子，可以稱爲名副其實的批評麼？我想沒有人會說『可以』。因爲既名之曰批評，即應從破的方面着手，不應從立的方面着手。固然，要破他的主張，自己必須立一種主張。但這應從破的中去立，不應從立的中去破。然中國的所謂批評家爲什麼專喜編講義式的批評而不採取真正批評式的批評呢？因爲前者最容易而後者最困難。一個人對於某項問題，只要讀一本十萬字的書，至少可以編成一種五萬字講義式的批評。遇着這部書上討論過的各點，他可以拿去做進攻論敵的武器，遇着沒有討論過的各點，他可以一聲不響地混過去；至於論敵有什麼主張，他可以依照書本上的說法，用一些空洞話去反駁，不必切實拿來加以討論。這是多麼容易的頑意見！

但一講到真正批評式的批評，情形便完全不同了。你的論敵在談天，你要跟着去批評他所談的天，你的論敵在說地，你要跟着去批評他所說的地，你的論敵在論古，你要跟着去批評他所

論的古，你的論敵在議今，你要跟着去批評他所議的今。舉兩個實例來說：「開山」胡博士在講先秦諸子，杜威，詹姆士，達爾文，你必須跟着去批評他所講的先秦諸子，杜威，詹姆士，達爾文；「中國昂格思」在講馬克思，摩爾根，「鋤頭考古學」你必須跟着去批評他所講的馬克思，摩爾根，「鋤頭考古學」。

講到這裏，那些編講義式的批評家必定磨拳擦掌地上前質問道：「我們何嘗沒有『跟着』，我們何嘗沒有『跟着』？」我的答案是：「你們雖也『跟着』了，只是遠遠地『跟着』，不是緊緊地『跟着』，換句話來說，不是旗鼓相當地『跟着』。」所謂旗鼓相當地『跟着』就是遇着重大而值得詳細討論和發揮的問題，你的論敵做一篇四萬字的論文，你最好回敬八萬字，否則四萬字也可以，至少總要兩萬字。我這種說法並不是只注意量而不注意質，質當然極重要的，有時還在量之上。如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約達十六萬字左右，而梁任公先生的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文（見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輯一至四一頁）雖不過一萬多字，但在質的方面真算是極批評的能事，大可作為一般講義式的批評家的模範文章。我說他的質好，

並不是承認他的意見都對，而是說他是名副其實地在批評胡先生的大著，不是像葉青先生一樣，名爲「批判」，實際是在「著哲學史」。但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大家都不知道或熟習的重要問題，單靠實的方面好是不夠的，必須在量的方面有充分的表現。這是參戰的人應當注意的。

「處處有路到長安」，立中帶破亦批判，難道一定要像你一樣規定破中帶立與實量雙全，才算得批評麼？我想參戰的人終會提出這個問題來相質問。我的答案是，凡標明要批評他的論文（自立一說而附帶批評他人的論文不在此例），如果做不到這個標準，絕不能算作健全的作品。爲什麼呢？理由最明顯而簡單。你如果持一種反對的態度（同情的態度不在此例）去批評別人的主張，你必須先用全力推翻他的主張，然後能建立你的主張，否則你便是在做滑頭買賣，自欺欺人。舉個例來說，郭沫若先生說西周是奴隸制，而周紹濤先生則認西周爲農奴制，持此說去批評郭先生，但他並不把郭先生的主張打個粉碎，只是自己找些證據，建立自己的主張。這是很滑稽的。因爲西周只有一塊地皮，上面的建築物或是奴隸制，或是農奴制，或是二者的混合制，或是其牠制度，但無論如何，上面只能容一種建築物，周先生沒有拆毀郭先生的偽建築。

物，怎·能·成·立·自·己·的·真·（這裏所謂真偽是就周先生的立場說的）建·築·物·呢？

這個例子明白表現，凡大張旗鼓，要批評別人著作的人，在實際上如不能從正面詳細反駁別人的主張，只是在大編講義之中，用旁敲側擊的方法，附帶東說一句，西說一句，這種人決不能算做批評家。批評本來是一種最煩雜的工作，本來是不容易擔任的。馬克思說：

『我是一個批評家』（"Ich bin ein Kritiker."）

像馬氏那樣敏銳無比的眼光，和百科全書式的腦袋，對於批評的工作，自然可以勝任愉快，並且咄嗟立辦。至於我們這些人，也要從事批評，那非有充分的準備，並極端小心謹慎不可。就我近兩三年來的學術生活講，我曾因胡適之先生說了「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叫我們明瞭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爲的選舉，都由於一點一滴的變異。」（見胡適文選序言三頁）這句不負責任的話，便花費五個月工夫，研究達爾文的著作和達爾文以後各家的生物學，完全擊破他的主張。我因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應用所謂摩爾根「先史民族進化階段」表，便花費一個月工夫，研究摩爾文的古代社會和昂格思的家庭私

產和國家的起源兩書，徹底解決他的胡說。我因要批評陶希聖先生的四部大著，便一方面替他的書做索隱，一方面借閱廿四史中的某幾種史書，因此花費六個月工夫，僅草成十萬字，然他所有的矛盾，他自己感覺不到的矛盾，我都替他指出來了。我說這些話，絲毫不含有誇耀的意思，我只是表明我們要想批評別人，須先下一番刻苦的工夫，多做準備的工作，然後能對我們的論敵下正確而深刻的批評。「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我現在把這句話改過來，叫做「欲求批評對，須下死工夫！」

但我們看一看論戰中的情形怎樣呢？是不能令人抱樂觀的。不諱言自己對於政治經濟是外行的胡秋原先生對於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發表意見道：

「李季先生在貢獻與批評中笑我不當贊稱陳邦國君的文章，其實我稱許過的幾篇文章，只是覺得那幾篇都還算是有意見的，而其餘的，可說很少發表價值之意。」（見文化雜誌創刊號胡又九頁）

在論戰中經歷過四年的陶希聖先生于看過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後，也發表他的感想道：

「論戰已有四年之久，現在應當是逐時代詳加考察的時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從事于詳細的研究……我希望短篇論文減少，多來幾部大書。」（見讀書雜誌中國社會

史的論戰第三輯陶文八頁）

大家把胡陶兩先生的話細玩一下，就可知道戰場中的大概情形了。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由於起來參戰的人平日對於社會科學和中國問題沒有多大的研究，所以在論文中處處露出捉襟見肘的樣子。中國的人才非常缺乏，這是一時改變不來，沒有辦法的。不過這不是論戰四年或一年沒有長足進步的唯一原因。此外，實在另有一個大原因，就是許多作者並非為解決中國社會史的問題而參戰，却別有用意。有的是為着解決麵包問題，乘機做幾篇文章，取得一筆發表費。這自然不能算作一樁壞事，不過各人應當儘可能地多下研究工夫，不要完全為着吃飯而參戰（我也是個文丐，不過我情願譯書去買錢維持生活，不願把這個戰場當做噉飯所）。有的是為着趕時髦，不管自己的力量怎樣，拚命製造貨物，向戰場上輸送，藉此取得參戰員的地位。

有了後面兩種情形，所以戰場上多係胡先生所稱的「很少發表價值」的文章，和陶先生



所稱的沒有「逐時代詳加考察的」「短篇論文」再明白些說，讀書雜誌發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合刊本至三次之多，文化雜誌又繼起于後，而內中却很少針鋒相對的文字，胡先生對別人的參戰論文痛下針砭，而他自己却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相製濫造者！他宣言在「病中」「竭三日之力」草成四萬字的大文，我雖絕對不相信，但我猜他也許是在十天或半月之內做成的。因此他的論文不獨包含三十種以上的錯誤，並且相浮淺薄到無以復加，例如我對於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內容明明舉出七個要點，他因來不及細看，遂只舉出一點來加以申斥（參看文化雜誌創刊號胡文三五頁）我對於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區別說至三千餘字，他因沒有能力反駁，遂用一句空洞話敷衍過去，就是：

「其實李先生所舉的七個特徵，一點也不是先資制與亞洲生產制區別的特徵，反之，更是中國先資本主義時代之「徵」」（見同書同號胡文一四頁）

像胡先生這樣的戰法，就是月出一本中國社會史論戰專刊，出至一百年，戰至一千二百次，也不會解決問題；因為他在廣告上，標題上和小註中雖裝腔作勢，大叫對我宣戰，在實際上，恰和歐戰

中國對德宣戰一樣，是宜而不戰！

然這却不是胡先生一個人的毛病，而是論戰場中一種很普遍的現象，故我不惜反覆加以申說。要消滅這種現象，只有請那些爲解決麵包問題而參戰的人忍痛少吃一片麵包，多用幾分工夫研究，更要請那些爲趕時髦而參戰的人在茶餘酒後多看幾部書，細心研究一下，再來出馬。無論如何，大家應拋棄「日草萬言，多麼合算或榮耀」的心理，廣徵博引並窮思苦索地做文章，尤其是要嚴格遵守梁任公先生所提出的「針鋒相對」的「戰時國際公法」。這就是說，大家不應當再做編講義式的批評文字，應做破中帶立的批評文字。中國近三五年來，社會科學的進步，比較迅速，但就論戰中針鋒相對的一點看，不獨趕不上古史辨的論戰，並且趕不上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這是一種羞辱，這是大家應當及時改正的。

我這篇序快達到三萬字，本來應當收束了，但還有一點如果不說明，足以引起很大的誤會。就是，我雖極力主張在論戰中打破資產階級的學者的紳士態度——即虛偽態度，讓我們的「真情之流」「自然流露」出來，但我並不是提倡專門罵人。我和人家論戰時，雖「有時且出以

一種嬉笑怒罵的態度，」然這只止于「有時，」我非至理直氣壯，情不自禁的時候，決不採取這種態度。大家試披閱我的一切論戰的文字，就可以看出內中所包含的嬉笑怒罵的成分是非常之少的。而並且我的嬉笑怒罵是如分而止，決非謾罵。任曙先生說得對：

「革命家有強烈的仇恨反動階級的情緒，但必須不忘理智，並立基于科學之上。深刻的詛咒是沒用的，應求深刻的認識。」（見任著中國經濟研究第一冊四一三至四一四頁）說來也奇怪，任先生知道說這樣合情合理的漂亮話，自己倒是一個謾罵大王，一個好作他自己親口承認的「沒用的」。「深刻的詛咒」專家！例如他因陶希聖先生引用了日本東亞同文會所調查的含有錯誤的中國耕地分配狀況表，便罵道：

「這顯然是日本帝國主義故意搗鬼，沒有別的。但帝國主義的工具們，中國一般資產階級的猴兒崽子，竟深信（？）不疑」（見同書一冊二二五頁）。

「我們可以說最後這一抄襲派，比較前面兩種抄襲派不僅可恥，更是兇惡萬狀。」（見同書同冊二二七頁）。

陶先生等如果是不知道那個表的錯誤而予以徵引，任先生只能責備他們不應如此輕率而盲目地拿來應用，如果是知道那個表的錯誤而故意徵引，任先生也只能罵他們是資產階級欺騙民衆的工具，何能醜詆爲「猴兒崽子」，「兇惡萬狀」？據我的推測，他們大概是出于無知，而不是出于明知故犯。因爲他們要欺騙民衆，方法很多，何必借助于這種一經比較真相立見的錯誤的表呢？錯誤是每個研究問題的人都會發生的，像馬克思那樣的大學問家有時也流於錯誤。然錯誤只是一種錯誤，不是一種罪惡。例如任曙先生自己把馬札亞爾的話一起徵引來誤作馬克思的話，並註明原文見資本論（參看任著一冊八二頁），陶先生或和他對罵的嚴震峯先生如照他的話回敬他，豈不也要罵他是無產階級的「猴兒崽子」，「更是兇惡萬狀」麼？然而陶先生或嚴先生却不這樣回罵，正是他們比任先生高明的地方，因爲這種離事實太遠的無聊的謾罵，映入讀者的眼中，不獨不會煽動他們對被批評者的憤恨，並且將引起他們對批評者的反感。所以即使不爲討論問題的前途計，專爲任先生個人的利益計，這樣的罵也是有損無益的。然而一個謾罵大王的罵，花樣是很多的，否則不成其爲大王！當任先生還沒有開始批評時，

即在他的大著的第一章說：

「但這裏，我想暫時不宜佈所引來的意見的一部分書報和作者的姓名。雖然我是本着真理的出發和革命的立場，而小布爾喬亞的學者是最怕損傷尊嚴的，恐將來在他們批評本書時生出題外的糾紛，反阻礙了真理的論究。」（見同書一冊三七頁。）

自第二章起，我們果然看見內中充滿了「見陶××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一章第一段第一句，『熊××中國社會史研究二三一頁，（一九二九）』和『嚴××再論中國經濟問題一八頁』這一類的東西。這樣一來，在表面上是任先生大發慈悲，極力替「最怕損傷尊嚴的」『小布爾喬亞學者』『掩醜』。在實際上是比罵他們做『資產階級的猴兒崽子』還要惡毒。因為這樣表見他們的著作都是污穢齷齪，不能見天日的，故用得着任先生代為『包荒』。然而『陶××』『熊××』和『嚴××』的名下既各附有書名，在讀者的心目中，誰不知道這是陶希聖，能得山，和嚴靈峯呢？即任先生又何嘗不知道讀者會知道此事呢？陶熊嚴等等的名字和著作一經任先生的『批評』都是出不得衆的！任先生這樣的罵人新法，我還是第一次看見。猗

歎休哉，謾罵大王萬歲！

大王的威風凜凜，固然不可侵犯，但我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所以當我做參戰論文時，很想批評他。尤其是大王曾下詔求賢，說：

「假使誰高興來指責我們錯誤的話，那是非常歡迎的，我們自己一點都不掩飾，但盼望以革命立場勞動立場爲出發。」（見同書一冊二八一頁）

我雖不是什麼「賢」，「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並且自信沒有離開過「革命立場和勞動立場」，因大着膽子，本我一得之愚，貢獻于大王之前。我在參戰論文中談到資本主義的生產出現，必須先有一個壟斷生產工具與生活資料的資產階級和一個一無所有，專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的無產階級出現然後才能成功，於是說道：

「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即已備具這兩個條件，所以自五口通商，西洋的新技術輸入以後，我們的產業資本主義便馬上可以發軔了。由此可見任曙君所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內在的而是外鑲的，這一特性久已爲談中國問題者所公認」」（見任著中國經濟

研究八四頁）等語，只是一種無稽之談，因為中國如果不備具發展資本主義的「內在的」條件，無論怎樣「外鑠」是「鑠」不來的，如果不信，就請任君挾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去鑠鑠五指山的黎人和雲貴等處的苗子！（見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輯拙文五六至五七頁）

我這段話本來是很合情理的，不意大王見了，勃然大怒，斥為「似乎太過混亂，簡直無從答覆。」（見同書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任文五九頁）但他于無從答覆之中，引用了劉鏡園先生的話來答覆我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由于外鑠，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用長槍大砲打破了中國的閉關狀態以後移植進來。」他于是得意洋洋地說道：

「大概這用不着我再饒舌了罷？我想這讓他們兩位馬克思主義老將去爭，讓我這真正的「新兵」休息幾分鐘」（見同書同輯任文六一頁）

但我還是要和任先生爭，不和劉先生爭，因為劉先生雖承認外鑠，並沒有明白否認內在的原因，而任先生則于他的說法之外加入「不是內在的」五個大字，那就非常機械地表現否認內在的

原·因·了·試·問·任·先·生·拿·他·的·話·做·護·身·符·有·什·麼·用·處·呢·？

然·大·王·也·有·大·王·的·聰·明·何·嘗·不·知·道·這·種·掩·耳·盜·鈴·的·把·戲·？·所·以·他·看·了·我·那·段·批·評·後·罵·性·復·發·一·面·修·正·自·己·的·主·張·一·面·預·先·把·我·罵·一·頓·說·：

「我·們·的·外·鑠·主·張·是·根·據·實·際·立·論·是·指·的·最·主·要·的·關·鍵·假·使·有·人·以·為·我·們·完·全·不·管·內·在·關·係·只·看·見·惟·一·無·二·的·外·鑠·那·麼·我·們·亦·只·有·付·之·一·笑·因·為·那·是·無·中·生·有·的·謠·言·之·故·」（見·同·書·同·輯·任·文·四·三·頁）

任·先·生·在·我·們·上·面·所·徵·引·的·一·段·話·中·明·言·「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內·在·的·」·此·處·竟·說·人·家·認·他·完·全·不·管·內·在·關·係·是·「無·中·生·有·的·謠·言·」·到·底·是·誰·在·造·謠·請·高·明·的·讀·者·判·斷·罷·。

任·先·生·既·以·謾·罵·稱·王·我·侵·犯·了·他·自·然·應·該·挨·罵·所·謂·罪·有·應·得·于·人·何·尤·？·因·此·我·深·自·反·悔·不·該·隨·意·批·評·以·致·引·起·大·王·的·斥·責·但·我·把·他·的·大·文·看·完·才·知·道·他·最·懷·恨·我·們——尤·其·是·我——的·地·方·並·不·在·這·幾·句·批·評·而·是·在·我·們——尤·其·是·我——根·本·就·不·應·當·起·來·參·戰·。·試·聽·他·說·罷·。



「過去大家都未開始此項全部工程，工程師也許睡覺去了，故此我這一個「不學無識」的工匠不得不出來承乏。現在呢，一樣還未能令我感到滿意，使我不能歇手（大家注意這個毛頭小子自誇的口氣。）這並不是我看不起我們衆多的工程師，而是事實上不得不：「相似的，主人，相似的奴僕，」無恥無能的是中國資產階級，自亦不能不因緣而出現。同樣不高明的「模仿人踏襲人，外國大商店的小小負販人」的一些買辦性唯物論經濟學的工程師，這是必然。這你說我詆毀了誰，我是管不着的，然而我却說的是說的沉痛的罪言！誰能否認「思想的混亂是統治者的利益」嗎？！然而我們衆多的工程師却又安之若素，甚至準備助長這一混亂，這又安得不令人髮指！」（見同書同輯任文六三至六四頁）

任先生這段話雖然很長，雖然帶有充分的外交家的詞令，但他的真意很簡單，我們可以用幾句話總括如下：

「在中國問題的研究中我是一個頂刮刮的老資格，那時你們幹什麼去了，「睡覺去了」麼？我苦苦開闢的江山，你們現在竟闖進來了，你們說這些那些，把思想愈加弄混亂了，

把我的權威削弱了。你們這些無恥無能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奴僕，你們這些不高明的「外國大商店的小小負販人」，「安得不令我任大王，頭髮豎起一尺長！」

我想這是任先生心坎子上的話，不過他不便這樣露骨的說出來罷了。他本人也許又要說我是在「造謠」，但高明的讀者必能證明我只是把他的真意和盤托出。他這個謾罵大王的罵自然比潑婦罵街的罵厲害萬倍，因為潑婦只知道罵：「死呀，活呀，臭呀，爛呀，而大王則於這些普通術語之外，還知道用無恥無能的「模仿人，踏襲人，外國大商店的小小負販人」和「買辦性唯物論經濟學的工程師」等等的新名詞。大王的知識遠在罵街的潑婦之上，宜其站在她們的頭上而稱王了！

不過任先生在謾罵的知識上雖可稱王，一到討論中國問題，其言行的卑鄙，見解的糊塗，實為論戰場中所僅見！試舉一例來說：他著了一部什麼中國經濟研究，自作一序，冒稱出自他的同鄉劉伯莊先生的手筆，故名為劉序。他在這篇所謂劉序中和老鼠援稱鈞一樣，自稱自地說：

「單是這本『緒論』就有劃時代的意義」（見中國經濟研究劉序一六頁）。

「劃時代的意義」是什麼意義呢？就是：

一、帆船代表封建經濟，

二、輪船代表資本主義！

馬克思固然說過：「手磨機產生封建領主的社會，蒸器磨機產生工業資本家的社會。」（見哲學的貧窮原文九一頁）但這絕不是指手磨機後來不會站在輔助的地位，替資本主義社會服務。任先生不明白這個道理，竟于中國海禁大開，帆船多裝運資本主義商品之後，主張帆船代表一種與資本主義對峙的封建經濟，豈非荒天下之大唐！昂格思談及英國的發達會說：

「舊封建法律的諸形態大半保存着，並取得一種中等階級的內容，甚至在封建名稱之下，直接注入一種中等階級的意義。」（見佛愛巴黑與德國典型哲學的尾聲原文五〇頁）這正是封建外表，資本主義內容的說法。帆船的問題，事同一律。自五口通商以後，牠僅殘留着封建的外表，實具有資本主義的內容。連這種事實都看不清楚的人，還在那裏高談中國問題呀！

這就是任先生「劃時代」的「名著」內容的一斑！現在總括起來說：他自己的學識是這

梯低，而謾罵的程度却那樣高，試問這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有什麼用處？如果謾罵可以解決問題，那讀書雜誌用不着出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號，只須請十個八個潑婦對罵一頓，令十個八個速寫記下來就成了！『深刻的詛咒是沒用的，應求深刻的認識。』任先生其猛省！

我胸中要說的話已經傾吐了許多，現在真正快要結束了。不過把上面的批評文字回顧一下，馬上又想到葉青先生「這個也反對，那個也反對，是自陷重圍底辦法」一句話。我的「自陷重圍」是完全沒有疑義的了。但我為真理而作戰，應不惜犧牲，為指摘戰場上的病態而慷慨陳詞，應得到追求真理的人們的諒解。俗語說：

「不·打·不·成·相·識。」

戰場上不乏勇敢有為的青年，也許因我們一打，打得互相認識，各人本着自我批評的精神，洗刷從前的錯誤，而努力前進，共同迅速解決我們正待解決的問題。這是就好的方面講的。

不幸成見做了各人的主人翁，大家不問什麼真理不真理，惟找些枝枝節節的問題，以報復為能事，那我當然成爲衆矢之的。至于我對付的態度可分為兩種，今特預先聲明如下：

一，我的論敵對我的批評雖非針鋒相對，而提出的問題的本身却甚重要，大有討論的價值，如胡秋原先生此次所提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一樣，那我只要有機會，一定起來應戰。

二，我的論敵對我的批評既非針鋒相對，而所提的問題的本身又不重要，目的只在于謾罵洩憤，如陳邦國和任曙先生此次所提的問題一樣，那我決定不再迎戰，任聽他們從頭至尾罵個飽。

末了，還有關於本書的兩樁事也要在此聲明一下。

一，本書前面一小部分雖在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三輯上發表過，但因我對於民族社會終止期的提早，不獨將內容改變了，並且新增了二萬字左右，即與此無關的各點，有的因為十分重要，從前的說明不充足，特予以增補；有的因為近乎枝節，不應在本書子上出現，特加以刪除。又對陶希聖先生的批評既係六個月以前的作品，取材當然只以他從前所出的四部書和其他散篇為限，近半年來他又刊佈中國政治思想史一二兩冊，並在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上發表一篇改變主張的短文，本書付印前，特將有關於對他的一二項問題批評的

材料，從新加入，以求完備

二、本書第一輯所批評的中西學者或文人，本在三十八人以上，而目錄中只表見六人，因為有些是在立中帶破時批評的，有些是在擊破一個主要對象時附帶批評的，如顧頡剛，錢玄同，胡適，安特森，路易，馬札亞爾，丁文江，周子同，葉青，顧孟餘，梅思平，梁園東，熊得山，周谷城，朱其華，楊東，蕓，黎際濤，任曙，杜畏之，李麥麥，拉狄克……諸先生都在被批評之列而目錄中的六人，有的是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的「宿將」，即郭沫若和陶希聖兩先生，有的是「俄國有名的」，「學者」，即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諾夫兩先生，有的是新近才入戰場的人員，即陳邦國和胡秋原先生。

我為什麼對於學術界好些有權威的人僅附帶加以批評，反把兩個新進的青年列在批評的主要對象的首尾兩端呢？這是有個原因的。我的參戰論文原名為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既要想有所貢獻，便當首先從立的方面下手，因此我對於自古至今的中國社會的發展，立了一個系統，依照生產方法的變化，分成五個時代，而我對他人的批評的標準與限度也由此規定出來了。上表所列的許多權威不是對於中國問題沒有有系統的說法，就是說的較他人

爲略，不能作我的批評的主要對象，故只能或詳或略地附帶提及一下。我談中國問題，是從古代講起，關於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一個時代，據我所知，沒有人比陳邦國說得更多而更錯誤的，因此我便從他開始了。他把氏族社會列在原始共產制之外，他的說法如果能夠成立，則我所標舉的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便沒有氏族社會的分，我一舉步就遇着障礙，所以嚴厲地指摘他這一點的錯誤，對於他的論文中其他階段不復提及，他不知道是不明白我這種用意，還是故意要來罵我，便在最近一文中說：

「我們希望李君對於我的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本身有所批評，不想竟末一言提及，只是咬文嚼字的東咬一口，西咬一口。（見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陳文二一頁）

其實我並不是不批評他的「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本身」而是因爲在共產主義生產方法這個階段，沒有越出範圍，批評他其他各點的可能。我旋在批評陶希聖先生的論文中又提到他對那個時代的主張，就是一個明證。不過像這樣的感想不是他一個人所特有，而是一般被附

帶批評的人所同具的。例如顧頤剛先生也說過：

「最使我惆悵的，是有許多人只記得我的『禹爲動物，出于九鼎』的話，稱贊我的就用這句話來稱贊我，譏笑我的也就用這句話來譏笑我；似乎我辨論古史只提出了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是已經給我這樣地解決了的。其實這個假設我早已自己放棄（見第一冊二二七頁。）就使不放棄，也是我的辨論的枝葉而不是本幹；這一說的成立與否，和我的辨論的本幹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這是對我最淺的認識。」（見顧著古史辨第二冊自序三頁。）

一個人對於顧先生「早已自己放棄」的『禹爲動物，出于九鼎』的話，故意加以譏笑，原不應該（我的參戰論文也批評了這一點，後來找出他自動放棄的說法，故本書即削去此項批評）；一個人如果批評他的全部著作只取枝葉而不涉及本幹，也不應該。不過我們在立的時候，或在破的一定階段中，批評了別人的主張，無論是『本身』也好，本身以外的贅疣也好，『本幹』也好，『枝葉』也好，希望他們以坦白的的心情，明白子以承認或否認，不要企圖在『東咬一口，西



咬一口』和『這是我最淺的認識』這一類空話之下，埋沒自己的長處，或掩護自己的短處，因爲這也是一種小小的手法，故我特別提出來說一說。

自陳邦國關於原始共產制的說法以後，對於殷周兩代的描寫無有過于郭沫若先生那樣詳細的，故我的目標轉移到他的身上。其次關於秦漢至清代這個長時期的說明，當以陶希聖先生爲巨擘，所以我又和他交鋒對壘了。這種事實足以說明我對於人們的批評，完全以他們對於某個階段所佔的位置爲轉移，並不是我存心要與誰爲難，便先從誰下手，也不是要避免忌誰，就對誰一字不提。由此可以證明陳邦國所謂：

『要曉得：神州國光社可以爲着讀書雜誌而借重「宿將」的身價，但李季的聲價是不值得爲着二元錢一千字的稿費而拍賣的！』（見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陳文二二頁）

這才是『東咬一口，西咬一口』的『胡說八道』（引陳某語）近幾個月來將自己的本身拍賣給人家的是誰，已成爲著作界一種公開的祕密，用不着我提及了。

我對於陶希聖先生的批評本分五大項，而本書第一集所載的僅至第二項爲止。以下的三項當編入第二集中。然在對陶先生的批評正待繼續之際，忽遇着文化雜誌創刊號出版，胡秋原先生左手挾着杜布洛夫斯基，右手挾着波卡諾夫，來向我宣戰。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問題，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是一個急待討論和解決的問題，胡先生使戰局向這一方面展開，是極有意義的，所以我暫時拋開對陶先生的批評，急起對這三位一體的巨人迎戰。當我動手草迎戰論文時，胡先生已是神州國光社的編輯，然我並不因此改變向來論爭的態度，這就是說，並不因此改變我對陳邦國、郭沫若、陶希聖、顧頡剛諸先生爭論時所持的那種嚴厲的態度，而神州國光社更不因此而拒絕本書的出版。這樁事是雙方人格的試金石，更是各小報和黨派捏造關於雙方的許多謠言的死刑宣告者。這樁事是雙方以真理爲前提，而不以私人關係爲前提的大公無我的真精神的表現。所以我將迎戰的論文刊在本書的後面作爲附錄，由神州國光社出版，其意義不僅在於對國人頗爲生疏的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問題，供給充分的研究的材料，而尤在於雙方對批評界樹立一種求真求實的獨立精神。這是我所最滿意的一樁事，而我的長序遂在這種滿意的

感情中告終結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作者識

序  
言

九三